

依法重选，重建董总：

董总危机资料集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林连玉基金

独立大学有限公司

华社研究中心

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

出版

2014年12月

目录

A. 序言：依法重选，重建董总

B. 董总危机问答录

1. 我们是谁？为何关心董总领导危机？
2. 董总发生什么事，其弊病根源在哪里？
3. 叶新田和邹寿汉犯什么错，为何非换领导人不可？
4. 叶邹在任董总交出怎样的成绩单？
5. 关中问题是撤换叶邹的唯一理由吗？
6. 为何董总与历来最亲密的战友教总分道扬镳？
7. 要求撤换叶邹就是“引狼入室”、“摧毁董总”？
8. 要求撤换叶邹就是“配合外力”，强行落实《教育大蓝图》？
9. 为什么说解散董总中央常务委员会，重新复选才是解决死结的最佳方案。
10. 撤换叶邹后，我们可以期待什么改变？

C. 重要文件

华团与7州董联会交流联合声明 2014年12月08日

教总文告：最后一次发表声明，回应董总对教总作出不实的指责 2013年7月27日

D. 评论文章

- | | |
|-----|---------------|
| 潘永强 | 叶邹不走，董总不能重新开机 |
| 骆清忠 | 后叶时代：重建新董总 |
| 黄集初 | 华教内战怎么了（摘要） |
| 陳友信 | 初探华教再出发 |
| 陈友信 | 初探统考新定位 |
| 陈友信 | 初探关中解决方案 |
| 陈玉璇 | 统考——契机与挑战 |
| 黄集初 | 再论关中争议 |

E. 新闻报导

邹寿汉“青蛙图”反击 指责4独中是吴三桂 《东方日报》2013年6月20日）

举报林连玉基金为非法组织，兴汉社促查是否涉及欺诈案 《当今大马》2010年11月23日）

序言

依法重选，重建董总

2013年年底开始，董总领导层爆发危机，犹如投下震撼弹，令马来西亚华社上上下下感到震惊。事件演变至今，七州董联合会公开与董总最高领导人决裂；董总中央则产生裂变，“改革派”应运而生，公开呼吁董总主席叶新田与署理主席邹寿汉二人下台。

这是继董总与教总分道扬镳以后，又一令华社倍感痛心的巨大事变。亲者痛，仇者快，然而舆论纷纷，莫衷一是，究竟谁是谁非？到底这场危机的根源在哪里，关心华教者莫不痛心疾首自问。然而回答疑问的结果也是一面照妖镜，照出谁才是真正关心华教命运者，谁才是破坏华教的人。

这场危机在在考验我们的智慧与理性，究竟我们怎样选择才真正有利于华教的发展。热情的参与需要冷静的思索，否则我们将因为一时的冲动被情绪摆布，最终做了错误的选择，殃及华教下一代。

我们是一群华社主干组织，来自不同的背景，但都同样关心华教的发展，而且长期在公民社会耕耘，推动民主人权进步。俗语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我们不忍心看见董总长城自毁，因此决定挺身而出，公开提出看法，于是整理这份资料集，供各界参考，希望有助于厘清这场危机，进而引导我们的实践。

我们欢迎理性的辩论，任何时候我们都准备拿出证据，公开举行辩论。然而，我们也知道各种私下不具名的流言黑函可能满天飞，做毫无意义的攻击与扭曲。

这份资料集首先是要献给各州董联合会与董总中央的主事者，他们在这场风波举足轻重，然而我们更相信董总的发展攸关千千万万华教的支持者，影响所有华校的家长、莘莘学子。我们希望，各州董联合会与董总中央的领袖不会忘记他们背负华社全体的期望，不要轻易地玩忽责任。

我们相信历史是最佳的裁判者，但是我们更相信立即行动纠正错误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

我们认为唯有依法召开董总中委会会议，解散董总常务理事会，并重新举行复选才是解决董总危机死结的最佳方案。我们呼吁各方协手合作，重建董总这座华教的堡垒！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林连玉基金

独立大学有限公司

华社研究中心

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

谨识

B. 董总危机问答录

1. 我们是谁？为何关心董总领导危机？

我们是社团与文教组织，历经岁月，与华社风雨同路。隆雪华堂成立于1923年，除关心华教与华社权益，向来积极建言国事，参与废除内安法令、选举改革等运动。林连玉基金推广林连玉精神，发扬多元文化精神。独大为新纪元学院提供地段，组织内汇集大批资深华教人士。留华同学会广结留华毕业生，积极推动马中文化交流以及独中教师培训课程。华研则是华社“智囊”，累积深厚的文化学术研究。

我们深知推动公民社会之工作并不易为，务必虚心秉公行事，不强势妄为，但也不逃避当仁不让之责任。我们正秉持这样的信念看待董总领导层危机。董总是华教最高领导机构，对外向政府争取母语教育权益，对内领导、规划华教发展。董总危机必定波及华社全体，重挫家长与学子信心，不仅导致内部发展停顿，甚至因动员与分化华社团体，导致民间力量分裂与溃散，令公民社会顿失一大臂膀。

为了解决危机，今年12月8日，隆雪华堂、华总、教总、独大等十一华团与柔、甲、砂等七州董联会在董总举行交流会，一致达成共识认为“董总主席叶新田、署理主席邹寿汉这些年来领导董总，基于个人的横行专断、颠倒是非、排除异己的行事作风，已打击与破坏了董总六十年来在华教运动的威信及地位”。七州董联会将与各华团共商重建董总方案，拟定华教未来发展大计。

本小册子正是延续上述对话之精神，希望公开揭露董总领导人之弊端，拨乱反正，重建华教之大业。

2. 董总发生什么事，其弊病根源在哪里？

2013年12月24日董总常委会流会，首次把董总领导层危机摊开在华社眼前，形成当权派与改革派对峙局面。2014年11月9日，由于主席叶新田拒绝把“开特大撤除邹寿汉”一事列入议程，8名常委愤而离席抗议，常委会再度流会。最严重的一次，应是2014年12月7日，叶新田不顾7州董联会抵制及全国众多华团反对声浪，坚持召开特大，结果不足法定人数第三度流会！

12月24日之流会，邹寿汉曾警告说，那是对主席投不信任票。若是这样，不到一年，叶邹已三度被多数成员投不信任票。任何具有最基本民主素养和自尊的领导人，都会选择鞠躬下台，而不是让组织陷入瘫痪。

叶新田于2005年开始担任董总主席，邹寿汉则于2007年出任董总署理主席。董总在这两人领导下，不到10年就很多原本关系密切的华教华团组织，包括教总、全国校长职工会、隆雪华堂、校友联总、林连玉基金和留华同学会闹分歧。这是董总60年来，史无前例的。

翻回历史，这都不是毫无预警的。叶新田任主席后剪除董总首席行政主任莫泰熙为首的行政处教育专业干部，以及新院院长柯嘉逊为首的学术精英。这种不尊重行政专业与大专学术的行径暴露其横蛮专断手法。

与其说董总今天才爆发危机，不如说董总早已沦陷，如今只是腐败外露，苦不堪言。追溯问题根源，这一切都和叶新田及邹寿汉的领导脱离不了关系。这两人不但对长久以来所建设的华教干部队伍造成巨大破坏，更导致华教统一战线四分五裂。

3. 叶新田和邹寿汉犯什么错，为何非换领导人不可？

董总危机据称源自改革派不满当权派垄断权力以及人事安排、滥用资源等众多因素，原本这些歧见可用少数服从多数，尊重专业，按章行事、奉行民主等原则协调处理，但叶邹二人视程序与民主为儿戏，无视多数派多次投下的不信任票举动，为巩固权力不惜破坏章程，不尊重社团运作程序，屡屡犯下恶质先例引发众怒，最终华社只能选择长痛不如短痛，呼吁通过重选撤换两人。

细数叶邹两人的错误，最关键的是缺乏宏观理念与战略方针，加上个人刚愎自用，排除异己，漠视专业，因此董总近十年组织建设可谓完全停滞，一次又一次的与主流华社团体对立，只能不断地制造危机感，炒作情绪动员狭隘的支持者，日益陷入孤立。

失去董总行政部资深和中坚干部以及新院青年进步团队之后，董总呈现人才断层现象，组织与行政规划缺乏传承，不但没有提出华教发展纲领，反之却出版一本又一本的汇报与文告集，把资源浪费在为叶新田个人学历正误辩护、新院课题驳论等。最粗制滥造，极具恶意的文宣还是邹寿汉发出的漫画，题为《新吴三桂引“青”兵入关》，影射吉隆坡四所独中支持关丹中华中学就像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此等以抹黑而不是理性讨论的手法，竟出自堂堂的董总二把手。

叶邹利用董总的金字招牌来煽动其他人，把不同意见者渲染为华教的敌人，套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甚至还歪曲事实，以误导华社。邹曾污蔑柯嘉逊院长“财务不安”，结果浪费10万元请会计公司调查，最终不了了之，而且还被法庭宣判诽谤柯嘉逊，需赔偿30万令吉。【按：邹寿汉因所聘请的通译员不是高庭所认可的通译员，再加上要求展延审讯被拒后，而因“技术性”理由被判败诉。较后，上诉庭谕令该案交回高庭重审。】叶邹不满林连玉基金领导人支持柯嘉逊院长，就在报章特意攻击，其支持者还向警方举报林连玉基金为非法组织。

叶新田拟召开12月7日特大，又扭曲2013年6月23日董总会员大会提案，误导社会宣称召开特大是要改变禁止关中考统考之议决，实则要借关中议题分化群众，以遂个人议程，完全丧失华教领导人该有的诚信与原则。

4. 叶邹在任董总交出怎样的成绩单？

董总是教育机构，俨然华社的民间教育部，并非是一般的社团，因此必须服膺教育专业，拟定许许多多方案应对时局的发展。检视叶邹在任董总的成绩单，其最大的弊端有二：一、削弱董教总独中工委，漠视教育专业，未提出华教发展大计；二、怯弱保守，未抓住政治转型，串联社会力量提出教育诉求，失去推进改革的历史机遇。

董总与教总组成独中工委，叶新田在2008年主导修改独中工委章程，削弱该组织，大量更换其成员，最终导致该工委名存实亡，沦为董总领导人的附庸，失去其专业性。独中工委于2005年提出《独中教改纲领》，但叶邹上台后就予以搁置，导致独中教改计划胎死腹中。于是乎，独中课程改革、考试改革、教育改革大体上陷入停顿。例如，以经费不足问题，大幅度删减教师专业培训课程，就是其苦果。

如今教育市场日趋多元，独中蓬勃发展，但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私立中学林立，国际学校雨后春笋般地冒现，大型独中或许还能自行寻找出路，但是微型独中则是处于挨打，董总未能协调独中发展方针，完全失去统领华教发展之资格。

另外，叶邹昧于社会大势，在承认统考与新院升格方面，则是未能广泛动员社会支持，于是只能被动、低调地等待首相开恩施惠，大选后寄望完全落空，完全暴露其政治无能的投机性格。

选后部长抛出承认统考条件说，叶邹不但未能动员社会支持，反而以轻率的态度回应。此等重大课题，董总大可以召开咨询会议，从教育专业着手，寻找各种方案，增进谈判筹码，而非装腔作势，毫无应对能力，典当莘莘学子利益。

新院管理方面，则是漠视2009年以降的巨大亏损，毫无作为。2008年的新院，盈余近百万。2008年的新院存款超过1000万。根据2013年新院财务报告书，2012年新院亏损100多万；2013年则亏损200多万。

5. 关中问题是撤换叶邹的唯一理由吗？

关中学生可否报考统考与撤换叶邹是两个不同的客题，本来可以分开考量。但是叶邹却利用对关中问题的分歧意见达致分化的效果，甚至将此课题扭曲为抵抗政党与亲政府实力的保卫战，并将自己职位受威胁说成是异议者向官方输诚的结果。

即便关中问题不存在，叶邹领导失职的问题依然存在。可以这么说，关中问题不是撤换叶邹的唯一理由，但是叶邹处理关中问题之草率与不负责任却完全暴露了两人处事的弊端。有关关中问题的任何分歧都应该理性和务实地讨论，可是叶邹却以关中考统考导致统考非法波及全国独中的恐吓论调令讨论变质。这也是首次有董总的领导人以政府的压制力量恐吓华社，而不是站稳立场，据理力争，令董总失去崇高的道德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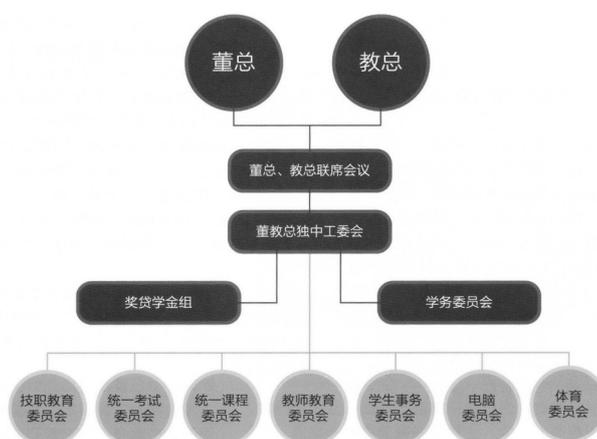
叶邹对关中立场反复其实暴露其根本不关心关中，只不过将其视为权谋的工具。独中工委会已经授权学务委员会撰写报告探讨关中是否可报考统考，未等报告出炉，叶邹却硬要召开特大商议此事，向来高调刁难关中考统考，可却宣称召开特大是要通过让关中考统考，说辞变化之快令人乍舌。

叶新田说：“独中工委会与学务委员会只是董教总属下的工作委员会，没有决定关中可否考统考的法定权力；董总才是母体，不可能要老爷子去听孙子的话”。

叶新田不但企图误导华社，甚至完全否定董教总独中工委会自1973年成立以来，在发展独中业务上重要领导地位。

董教总独中工委会是由董总和教总联合成立，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组织结构图，已经明确说明董总和教总在独中工委会里的同等地位。一切有关独中的事务，包括独中统考，均由独中工委会去筹划与落实，而且数十年来，都有效的推展和完成各项工作。因此，董教总独中工委会在独中事务上具有最高决策权，而不是叶新田所说的董总才是母体。

董教总独中工委会组织结构图



6. 为何董总与历来最亲密的战友教总分道扬镳？

教总成立于1951年，董总则成立于1954年。董总和教总长期维持良好合作关系，并肩作战，因此，被华社称为“董教总”。无论在陈济谋和林连玉、林晃昇和沈慕羽，还是郭全强和王超群领导董总和教总的期间，在处理重大华教事务，董总和教总都能够一起坐下来讨论和策划，并邀请其他华团参与，以加强争取华教权益的力量。

但是，叶邹领导的董总却“变质”了，变得专横霸道。在很多华教事件上，都是他们俩自行决定，并先行对外公布，然后才通知教总参与。教总因为许多事情没有事先被照会，或是一起讨论，以寻求共识，因此教总在一些事件上和董总持有不同的看法。尽管如此，教总还是给予董总尊重，也没有去破坏董总。

然而，叶邹却无法接受教总不服从他俩的“命令”，于是通过媒体发表不符事实谈话，歪曲事实，一再攻击和抹黑教总，特别是邹寿汉更是发表“温水煮青蛙图”来公开嘲讽和破坏教总，并在公开场合上指责教总的理事都是公务员，不应与董总平起平坐。他称，华校教师若是基于本身作为公务员，为了现实生活，如果不能公开力挺董总的抗争，也不必要扯后腿。邹寿汉这番话企图贬低教总和华校老师，以打击和破坏教总。数十年董总和教总的兄弟情就被这样彻底破坏了。

7. 要求撤换叶邹就是“引狼入室”、“摧毁董总”？

领袖可来可去，唯独组织长存，如果领袖不适任或有重大错误，更应该撤换。然而，叶邹面对外界批评，不是虚心检讨，而是把自己俨然当作董总化身，把一切善意的监督与批评都视为破坏。

叶邹的支持者炮制所谓的“董总保卫战”，以抵制政党入侵等等阴谋论其实掩人耳目，目的在于掩饰个人错误，借助董总金字招牌的庇护袒护过失。华教领导队伍过去都有不同的背景，衡量其标准是有无为华教作出贡献，而不是毫无证据地对他人扣帽子。如果要指责对手拥有政党背景，叶邹何不也将自己支持者的政党背景也一样摊开在阳光下供人检验？

其实，叶邹过去与马华保持良好关系，特别是在新纪元事件上更是“合作无间”。他会与马华领袖魏家祥闹翻，是因为吉隆坡增江北区华小一事。叶新田在吉隆坡增江北区华小担任董事长期间，不但对学校发展漠不关心，甚至还大量安插自己人进入董事会，包括让邹寿汉一步登天担任署理董事长。短短几年里，就引起学校校友、学生家长和村民的不满，组成新的董事部取而代之，以让学校有更好的发展。叶担心因董事闹双胞，导致自己的主席职不保，于是炮制政治阴谋论，指自己地位不保是政治人物的报复行动所致，是要对付

8. 要求撤换叶邹就是“理应外合”、“配合外力”强行落实《教育大蓝图》？

这又是叶邹炮制的一种阴谋论。众多华团多年来对政府单元教育理念都是持一贯的反对态度。然而，如今反对叶邹却被抹黑为企图配合政治势力强行落实《教育大蓝图》，实践单元教育理想，这等毫无根据的指责只能让人觉得齿冷。

其实，教育政策乃是一门专业，董总因为长期忽略研究，早已无能回应政府的诸多政策与措施。因此，最廉价的方式就是以抓住“政府打压华教”一点，就足以大作文章，打造捍卫华教的高大全形象。实则，董总对《2013-2025教育大蓝图》根本缺乏深入的研究，忽略了该蓝图涵盖方方面面，如教育平等、教育行政管理、教师专业、课程设置、考试与评量等，对这些内容毫无置喙的能力。

林连玉基金、华研、隆雪华堂等机构设立专案小组，专门研究《2013-2025教育大蓝图》（初版），并出版了《改革国民教育》中英文版，逐条回应大蓝图，提出细致的意见；而且多次与教育部单位对话，提出了有力的回应，部分建议甚至获得采纳。这些工作原本是董总应该主导的，但由于与大部分华团闹僵，自己也无能为力，只能依老旧手法，依样画葫芦，显示其已落在历史的后头，不思进取。

9. 为什么说解散董总中央常务委员会，重新复选才是解决死结的最佳方案。

叶邹对董总组织已经造成无法弥补的破坏，眼下当权派与改革派对峙的僵局唯有回到董总中央委员会才能解决。谁要是能够取得大多数中委的信任，就应该担任领导。然而叶邹知道己方居于下风，于是以拖延手段迟迟不愿召开中委会，唯恐自己遭投不信任票下台。

重新复选常务委员是回归章程，尊重制度的做法，也是减少社会冲突代价的最佳方案。众多资深华团领袖都提出重选方案，叶邹不应该再逃避。

10. 撤换叶邹后，我们可以期待什么改变？

我们不敢说明天一定会更好，但是只要叶邹在位，局势只能继续更坏下去。董总的领导陷入僵局，华教发展、独中教改、课程改革等等重大事务就无法启动，为了一两人的面子与权力，华社能承受这么大的牺牲吗？

华团与七州董联会交流会声明表明，未来将共商重建董总方案，拟定华教未来发展大计。我们希望继续推动此事，提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咨询华教所有利益相关者意见，让华团、家长、学生一起打造新的华教发展蓝图与远景。

C. 重要文件

叶邹下台 重建董总 华团与七州董联合会交流联合声明 2014年12月08日

1. 今日是长期与董总在华教运动并肩作战的华社重要文教团体，对于当前董总发生的危机，已严重削弱华教运动的力量，怀着维护华教、解决问题的心愿，与七州董联合会进行交流与对话；
2. 交流会在充份的讨论后，与会者一致认为董总主席叶新田、署理主席邹寿汉这些年来领导董总，基于个人的横行专断、颠倒是非、排除异己的行事作风，已打击与破坏了董总六十年来在华教运动的威信及地位，必须立即引咎辞职；
3. 与会者也一致认为董总必须重新团结与引领华社华团，捍卫与发展华文教育。
4. 七州董联合会将与各华团共商重建董总方案，拟定华教未来发展大计。
5. 呼吁其他州的董联合会认清董总当前危机的根源，与七州董联合会站在一起，消弭危机，重建董总。

联合声明单位：

华团：

教总
华总
校友联总
独立大学有限公司
隆雪华堂
华社研究中心
林连玉基金
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
吉隆坡大同华小董事会
森华堂青年团
森美兰华校校友会联合会

七州董联合会：

柔佛州华校董教联合会
马六甲州华校董事会联合会
檳城华校董事联合会
吉打华校董事联合会
玻璃市华校董事联合会
吉兰丹华校董教联合会
砂拉越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教总文告： 最后一次发表声明，回应董总对教总作出不实的指责。 2013年7月27日

对于董总一再歪曲事实，对教总作出不实的指责，教总深表遗憾，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最后一次针对此事发表声明，以正视听。

1. 没有参与各项集会的根本原因

1.1 董总在声明中再次提到教总选择疏离董总，并刻意回避联办重大华教课题大集会。这其实是董总为了掩饰本身破坏了董教总向来一起密切合作的模式，并引发今天的矛盾，而蓄意颠倒事实黑白，以转移群众的视线。

1.2 事实上，教总在7月24日发表的文告中，已经清楚说明教总没有参与各有关集会的前因后果。其中的根本原因就是，董总破坏了一向来在重大华教课题上，都是由董总和教总一起讨论和策划，有了决定后，再对外公布，并邀请其他华团参与的做法。因为，董总现有领导人的做法是单方面自行决定，并先行对外公布，然后才通知教总参与。这种迫使教总在完全没有被知会和一起讨论的情况下，就必须参与的做法，对教总是非常不公平的。董总不愿意针对此根本问题作出回应，反而继续发表歪论，顾左右而言他，继续误导华社，这是教总感到遗憾和痛心。

2. 华教诉求事件的真相

2.1 董总在其声明中指出，去年8月间七大华团向首相提呈“华教诉求”事件，教总和董总大力反对采纳“诉求”两字，并恫言如果董总坚持采纳“诉求”字眼，那么教总和董总将不签署这份文件。为了尊重教总和董总，董总在无奈之下唯有弃用“诉求”两字。教总表示，这是不符事实的。

2.2 事实的真相是：当时是七个华团出席会议一起讨论，包括有关备忘录名称。当时董总建议采用“诉求”的字眼，会上有不同的意见，其中，董总表达如果用诉求的字眼，董总就无法联署。教总则表示，希望各华团都能够一起签署，因此就交由出席的华团决定要采用什么名称，教总根本就没有恫言如果用诉求就不要联署，这是不实的指责。最后大多数的华团都不同意用诉求的字眼，这是会议集体的决定。在民主的社会，特别是作为争取民主的社团，这是大家必须尊重的会议决定，而不是归咎于教总。这是严重的歪曲事实。

3. “1125和平请愿大会”

3.1 有关“1125和平请愿大会”，由于这项请愿大会也是董总没有照会其他联署备忘录的华团的情况下，单方面作出决定和宣布，各华团都不知情，因此，教总在有关大会于11月25日举行前，就于11月17日发表文告表明立场。事实上，王超群主席当时也确实是在中国海外交流协会的邀请下，于11月24日至12月1日前往北京参加海外交流协会的活动。但是临时接到副首相办公室的通知，副首相将于11月26日约见教总、华总和全国校长职工会代表，以针对教育大蓝图事进行交流和讨论。由于事关重大，王超群主席唯有临时改变行程，在和副首相交流后，才飞去北京。

4. 2013年6月26日教育部召开的会议

4.1 对于今年6月26日，教总、华总及全国校长职工会在董总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席教育部副部长叶娟呈召开的会议，教总表示这是副部长召集的会议，教总只是受邀出席，董总应该是要去问叶娟呈副部长为何没有邀请董总，不应怪罪于教总。不过，据了解，副部长是邀请有参与“解决华小师资问题圆桌会议”的团体出席，因此教专也同样受邀出席。而董总因为在去年就已经退出圆桌会议，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没有在受邀名单内。

4.2 教总吁请教育部日后召集任何讨论华教课题会议，都应该够邀请董总出席。与此同时，教总也希望董总能够积极参与教育部所召开的会议，以直接向官员表达意见，加强争取的成效。

5. 华小第二阶段国文科上课时间事宜

5.1 有关华小第二阶段国文科的上课时间事宜，教总已经在7月19日的八华团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清楚交待。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教育部在之前都没有公布具体的上课时间表，因此有关的备忘录就依据当时的情况而拟定。

5.2 随着教育部后来公布了完整的时间表后，教总和全国校长职工会作为实际参与教学工作的专业身份，就根据情况的演变，以及华小在教学上的实际需求，从教学专业的角度作出研究，并提出反建议。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时间表，华小第二阶段国文科从每周180分钟增加到270分钟。而教总、全国校长职工会及其他的六个华团则认为必须从270分钟调整至210分钟，以符合华小的实际需求。事实上，这也是政府在80年代推行3M制时，董总和教总向教育部提出的华小第二阶段国文科上课时间要求。

5.3 与此同时，教总及有关华团也建议，华小第二阶段的英文科上课时间，应该从目前的每周120分钟增加到210分钟，和国文科一样，而华文科则是继续维持每周300分钟，以在不影响华文教学的情况下，提升华小学生的国文和英文的掌握能力。

5.4 事实上，调整上课时间虽然有助于改善国文科的教学，但华小在国文科教学上面对的

最大问题，在于目前所采用的国文课本和教学法不符合华小的实际需求，进而影响了学习国文的成效。由于国文并非华裔学生的母语，因此华小的国文课本必须以非母语（第二语文）的教学法来编写，同时也必须培训以第二语文教学法来教导国文科的专业师资，以符合华小的实际需求。这是华社必须关注，并向教育部极力争取纠正的，以有效提升华小学生的国文程度。

6. 不再对类似事件作出公开回应，努力恢复过去合作模式

6.1 马来西亚七大乡团协调委员会在昨天（7月25日），召集华团“教育课题”交流会，邀请董总、教总、华总和中华总商会出席，以针对董总和教总的关系，以及关中事件进行讨论和交流。会上，华团的领导人都表达了对董总和教总关系演变的关心的担忧，并殷切期待能够恢复过去一起合作的模式。

6.2 有鉴于此，基于对七大乡团的尊重，而且也要感谢七大乡团的诚意协调，教总不会再对类似事件作出公开的回应。教总希望大家都能够向前看，一起努力，为华教发展作出更大的努力，就像叶新田博士在昨天交流会上所说的，在华教工作上，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必须求同存异，并尊重不同的意见。这是非常正确的，并希望能够真正加以贯彻，就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D. 评论文章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150141:](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150141)

《东方日报》 2014年11月24日

叶邹不走，董总不能重新开机

潘永强

2014年10月下旬，有六州的董联会联署，要求董总召开特大，撤除邹寿汉的署理主席职务，由于董总主席没有依章行事，拒绝召开特大，不只严重违反章程，也导致董总内部民主瘫痪。在叶邹两人的恶质操控下，当下的董总与华教运动已经陷入当机的状态，如果叶邹不走，董总几乎无法重新开机（restart）。

董总如今在外失去华团与社会尊重，日形孤立，在内则矛盾和纠葛频生，士气低落。如果董总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组织，它的乌烟瘴气大可不理，但董总却是肩负国内华文教育发展的领导力量，包括统管全国独中的课程发展、统一考试，以及创办了一所高教学院。董总领导如果堕落、愚昧和腐败，必将为华文教育运动带来毁灭性的恶果。

今天董总陷入当机的状态，许多人都有不能推诿的负责，包括当年拱抬叶邹两人相继上位的人士、纵容两人在董总内部横行霸道的常委和中委、无视董总领导失灵与无能的各州董联会，以及处处以和为贵、大事化小的华团保守文化。

透过叶邹的现象，反映华社公民社会内部治理品质的低落，以及非营利组织领导的乡愿、犬儒与非专业。如果我们社会对公共事务的治理文化不作反省与提升，叶邹的现象仍会重演，走了一个叶新田和邹寿汉，还会有100个叶新田和邹寿汉。

为甚么叶邹两人非走不可？要叶邹下台，是不是个人恩怨与派系斗争？叶邹如果不离开，董总有没有重新出发的希望？以下整理若干要点，说明叶邹两人已沦为华教负资产。

董总失去青年认同

第一，叶邹两人自从上台后，相继剷除了大批董总行政部的资深和中坚干部，随后也摧毁新纪元学院历经10年建立起来的青年进步团队，打压与污蔑坚持学院自治和学术独立的进步学者。由于大批专业、积极和进步团队的流失，过去8年董总行政部建树甚微，新纪元学院则折损连连，保守当道，不再是青年专业精英的向往之处。

第二，叶邹两人领导期间，董总日渐丧失进步性，令董总从国内受人尊敬的非政府组织，沦为一个保守与反动的落后团体。他们没有利用 2008年大选前后的有利形势扩大董总能量

，反而拒绝参与跨族群的反对数理英化大游行、拒绝参与2013年大选前的华团支持两线制文告联署。由于董总的保守性格，它逐渐失去整个世代的年轻人认同，结果日渐老化、迂腐与向内捲缩。

第三，叶邹两人经常误导社会，撒谎成性、说谎成瘾，难为社会表率。他们在新院事件的特大上，污蔑在社运界备受尊崇的柯嘉逊院长「财务不安」，当叶新田欲召开1207特大，又胡乱引用2013年6月23日董总会员大会的议决，意图误导社会舆论，以遂个人议程，有失华教领导人的庄重和尊严。

缺乏理念沉迷权争

第四，叶邹两人无视组织章程、不尊重社团运作程序，屡屡为公民社会犯下恶质先例。他们一方面违章拒开特大，但又未经集体商议就滥用特大程序，不尊重独中工委会议的议决与地位，蔑视华团之间的协议与共识。两人频频违反会议规范、否决会议议决，连董总内员也对他们失去信心和敬重，所言所行，具为民间组织留下错误与负面示范。

第五，叶邹两人性狠好斗，与华团关系恶劣。在林晃昇时代，董总诚为公民社会的领导核心，团结集体力量，抗衡国家霸权。但在叶邹领导的黑暗8年，两人采取区分敌我、亲疏有别、以我为主的霸道态度，面对意见不同的华团，相继以分化、攻击、污蔑、抹黑的手段待之。叶邹先后与林连玉基金、隆雪华堂、校友联总、留华同学会、华总、校长职工会等主流华团对立，最后更与长期盟友教总分道扬镳。叶邹日形孤立，只能在社会边缘人士中取得温暖。

第六，叶邹两人没有教育理念，只有权力斗争，也鲜少提出过独中发展的前瞻性看法，他们少有见解，也不见热情。面对国际学校林立，私立学校兴起，董总未见应变之道，独中的课程转型、考试改革亦停滞不前。叶邹行事粗糙和务虚，面对国家政策缺乏研判能力，董总行政部因庸人当道，已无力提供研究分析，两人作风鲁莽，无法得到有尊严的学术和教育专业人士支援。叶邹不走，独中教改绝不乐观。

第七，叶邹两人缺乏领导董总的中心论述与思想储备，没有公共说理能力，加上董总行政部的研究队伍涣散，一旦面对外界的异议和碰撞而有需展开辩论时，就采用粗暴文字恶意伤人。叶邹长期雇用「要饭的文棍」，在暗处向过去盟友发动造谣污蔑、人身攻击、煽动造假，出版不少垃圾文章和丑化漫画。董总是教育机构，不是流氓黑帮，这种行为在愚民愚众中或有影响，但在社会观感中则大失风范。

叶邹8年以来分裂董总，分化社会，劣行累累，限于篇幅，只略提以上几点。总之，这两人已无法继续有效的领导董总，但他们面对社会舆论时，仍选择性地以不应干预内政作为挡箭牌。然则，华教运动是社会投入最广泛的共同事业，华教主权在民，不在叶邹两人，人人都是华教运动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挽救董总人人有责。董总领导没有任期保障，随时都可以下台或重选，叶邹离开董总才可以重新开机，否则就有报废之虞。

后叶时代：重建新董总

骆清忠

假如华社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性，那让关中考统考及叶邹下台应已是指日可待，接下来华社必须认真面对的是如何在后叶时代里重建新董总？

下列几点思考，不一定完全正确，提出来供同道们做个参考：

一，坚决认清董总是依华社意愿及支持而成立，她是属于华社，而非属于一、两个人的私有机构，更不是让任何人当为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场所。董总不论是在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华教的主心骨。华社必须坚决地支持她、关心她、保护她，并确保类似现有领导层这种争权夺利的历史永远不再重演。

二，辩证地看待叶邹事件。因为叶邹事件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反面教材！如何重建新董总，可能大家会提出许多不同的看法，但我觉得大家只要通过对潘永强博士11月25日在《东方日报》发表的〈叶邹不走，董总不能重新开机〉一文中所提的——为何叶邹已沦为华教负资产的非常精闢的7个要点做逆向思考，肯定能找出许多有效的启示。这种辩证关系很符合俗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及《易经》中「否极泰来」的哲理。

想当年，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引来的挨打，怎能有中华民族的觉醒？没有八股文的迂腐，怎能有新文化运动？没有毛泽东扭曲人性的「文化大革命」，又怎会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及随之而来的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的全方位复兴？也就是说通过这种辩证思考，我们可以对潘永强博士针对叶邹事件中提出的7个要点中的负能量做逆向反思，从中找到重建新董总的正能量：

逆向反思浴火重生

(1) 相对叶邹的剷除异己及打压青年专业精英，新董总必须学习林晃昇时代那种海纳百川、开明及开放的领导方式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大力培养和提拔青年专业精英，为建立接班人体系做准备。

(2) 相对叶邹的保守老化、迂腐内缩、脱离年青人，新董总应具有前瞻、活跃、新颖、外延的思路以争取年轻人的认同和参与。

(3) 相对现今领导层为达个人议程的作风，新董总应以光明磊落、坦白真诚的态度去对待所有的同道。

(4) 相对叶邹无视组织章程、不尊重社团运作程序及内部组织单位的作风，新董总应坚持依组织章程、民主程序及尊重各组织单位的态度来处事。

(5) 相对叶邹以我为主的态度，新董总应以海纳百川及互相尊重的态度团结各华团的力量，共同枪口对外为华教事业而奋斗。

(6) 相对叶邹缺乏教育理念及独中发展的前瞻性看法和教改及教研的停滞不前，新董总必须快速集中力量建立一支高水平的以教育专业人士为骨干的教研团队，以推动独中的教研及教改的工作。

(7) 相对叶邹缺乏一个领导董总的中心论述与思想储备，新董总必须通过专业角度及过程研讨出一套完整、前瞻性的有关领导董总的中心理论来引导董总的工作。

上述7点逆向思维虽不能包括新董总所能做的或所应做的一切重要的工作，（例如日显重要的跨族群方面的工作等），但它们基本上已为董总的浴火重生指出了可行的方向。

三，董总并非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组织；它是大马华教运动的火车头。它不是一个可以随便让人来勾心斗角的场所。在面对大是大非问题时，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不能不分轻重地处处以和为贵、大事化小这种保守的犬儒文化方式来模糊主题，甚至导致姑息养奸的恶果。

因此，我们对新董总领导层的素质要求是要远高于其他社团领袖。新董总的领袖必须时时都是走在群众前面的领路人，因此他们必须具有很强的前瞻能力，时时事事都能站得高、看得远。这种领袖多以他们的能力和魅力、而不是以权力和势力来领导。

触类旁通分辨是非

看问题必须能通过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融汇贯通去分辨是非黑白；处理问题也能依轻重缓急的重要性来依序处理。而华教运动的民族性及时代性也要求领导人要具有扎实的中西文化底蕴，很高的道德能力、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归纳能力、表达能力、组织能力、甚至专业能力。四，说实话，具有这种高素质又愿意献身华教运动的领袖实在不容易找，只能是可遇而不可求。

在无法达到这高素质水平的情况下，新领导人必须瞭解自己的局限性，並实事求是地采取集体领导的方式，以及把权力下放给最合适的其他同仁，以达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之效。

通过集体领导及权力下放並沿著上述7点反思去探索，在团队同仁及华社鼎力配合和支持下，相信没有大成也必有小成或中成；就算有错也只有小错而无大错。但相对叶邹的领导肯定会是一个浴火重生的进步！

五，1893年，德国哲学家恩格斯在给他的俄国朋友的信上这么写道：「像你们这样伟大的民族，是经得起任何危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进步得到补偿。」相信做为伟大中华民族后裔的大马华裔，必定也会从这次华教8年历史灾难中得到新的历史进步的补偿！

《当今大马》2014年12月1日 中午1点00分

(原文长达9000多字，这里只摘取部分)

华教内战怎么了

黄集初

【时政】天下未集

现今华教之所以纷纷攘攘，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现任董总主席叶新田。我对叶新田的主观评价，就是：外施仁义而内多欲，紧握权力而不容一丝一毫的威胁，对他认定为威胁自身权位者，常人前示好，背后设局。

由于其权力慾是极其强烈，所以，他不管到那一组织，只要掌握实权，总是要把他的核心班底安插在里面。这也是他到那里，那里就会有纠纷的最大原因。除非有关组织已经被他牢牢掌控在手，才会无风无浪，比如雪隆董联会。

增江北区华小的纠纷

像增江北区华小董事会纠纷，他是二号人物时，是无风无浪。可是在他当上董事长后，就出现问题了。董事会就只有15个位子，当他把自己人大量安插进董事会，以便能牢牢掌控董事会时，当地人怎么会没有感受。加上他又不信任校长，又另外任委亲信担任董事会执行秘书。所以，他有董总主席光环罩身，本来就没有人要挑战他，结果却搞到人家要拉他下台。

当时，反叶者是很辛苦的，因为叶有董总主席的光环罩身，公开批评叶的结果，一定会被华社大力谴责。只是后来叶新田和魏家祥闹翻了，才给反叶者有一局官员要怎么处理呢？按照董事会组织条例的规定，校长是董事会的当然执行秘书。所以，一份名单有校长的签名，另一份名单却没有校长的签名，那当然是以校长的签名为准。不过，据闻在之前，当叶和魏家祥关系良好时，魏家祥运用其权力压下这两份名单不处理，使得叶可以续继沿用旧有的董事会名单。所以，当叶与魏家翻脸后，魏只要放手，任由有关官员照章行事就行了。

事实上，华小校长是很难跟整个董事会对抗的，但当董事会一分为二时，校长就处于一个很关键的位置上。如加上一方排斥校长，一方拉拢校长，胜负其实是很明显。所以，与其说马华公会去搞叶新田，倒不如说是叶自己搞到马华公会有机会整他。

在上述增江北区华小董事会事件中，有提到前期叶新田与马华公会保持良好的关系，而后期则和魏家祥全面闹翻，进而似乎与马华公会决裂，这中间有一个大转折，箇中的原因后面再提。

铲除莫泰熙与柯嘉逊

话说回董总的部份。当叶新田坐上董总主席的位子后，他也是想把他的核心班底全面的安插到各个关键位置，以便牢牢地掌控，但董总的组织太庞大了，而且各方诸侯各据一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他采取的策略就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联合次要敌人来打击主要敌人。第一步就是处理莫泰熙。当时他请出几个人去劝退莫泰熙，其中一人就是吴建成校长。基本上，还算是很顺利地劝退了莫泰熙。下来，就处理秘书处，把所有被认为是莫泰熙的人，一一地逼退，也上了新闻版，还好，没有闹出什么大风波。不过，这个过程中，就可以看出叶新田的气量了。

接下来处理柯嘉逊时，就闹出新纪元风波。这个时候，吴建成校长是强烈反对撤换柯嘉逊，所以，就和叶新田闹翻了，很不客气地责骂叶新田是“华教败家子”。新纪元风波过后，叶新田开始着手处理削弱独中工委会，这件事情大概只有圈内人才清楚，而我正好在这个时间点，被教总委任进独中工委会，也因此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叶新田的为人。

着手削弱独中工委会

叶削弱独中工委会的其中一个步骤就是把学务委员会降为一个纯咨询的单位，然后又不断对工委会以外的人士强调工委会是附属于董总。今天，有很多叶氏支持者引用2008年的工作报告书的内文，来证明独中工委会确是附属于董总的下行单位。其实这是不准，应该以独中工委会的组织章程为准，而且2008年正好是叶新田开始着手削弱独中工委会的那一年。

为什么是2008年？因为这一年刚好是独中工委会换届的那一年，而叶新田也大权在握了，所以，大量更换独中工委会的委员，王超群也很配合他，把叶新田不想要的人选给换掉，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么资浅，也可以成为委员之一。所以，一堆新人加上叶新田的自己人，第一次开会就修改章程，跟大家说学务委员会应该长成这个样子，旧人不出声，我们这些新人都不懂学务委员会以前是长成什么样子，问我们有没有意见，我们怎么会有意见呢。

狙击林连玉基金

在“私有化”独中工委会的同时，叶新田的一个大动作就是狙击林连玉基金，有关的过程，请参阅之前写的文章：《董总应临崖勒马》，这里只补充几点。一、在当时，林连玉基金的主席是邹寿汉。结果，在发现不能掌控林连玉基金后，就辞去主席一职，董总代表全面退出林连玉基金。开始不知有何用意，后来才知原来是准备全力攻击林连玉基金为非法组织。这显示了叶派的特性，即当不能掌控时，宁可摧毁之；二、攻击的第一步就是把林连玉基金定性为反董教总。

外人看起来可能很奇怪，好像没有什么杀伤力，其实这是给自己人看的，先把你定性为“黑五类”，然后就可心安理得地无所不用其极来对付你。对付关中其实也是同样的手法

。去报警讲林连玉基金是非法组织，去报教育局讲关中校长在周会上使用华语训话等等，看起来很不可思议，其实你从他们的内在逻辑来理解，就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在他们眼中，这些都被董总定性为“黑五类”，所以，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包括利用官方的力量。

对马华公会态度的转变

下来讲一讲，叶派前后期对马华公会态度的转变。在前期，大概是从叶新田上位起至2010年左右，叶新田和马华公会的关系是非常好，据新闻报导，还准备与马华公会针对教育课题联手拟定备忘录，呈予正副首相。那时，叶新田和方天兴也是维持非常良好的关系，也参与华总召开的“五大华团”定期会议，即华总、董总、教总、商联会（中总），及七大乡团协调委员会。

这个时期的董总，除了内战，对外是表现出一种相对温和和保守的路线。可是，明显地，从2012年起，尤其是325抗议大会，董总突然转换路线，采取一种极左的激进路线，开始了一连串大集会，及退出教育部华小师资特别委员会圆桌会议，也因此和马华公会、华总、教总一一交恶。

关中只是叶氏权斗武器

那关中又是怎么一回事？有关关中课题，我前后写了三篇文章：《第 61所独中乎——论关丹中华中学》、《第 6 1间独中乎？（补编）》，及《再论关中争议》。前两篇主要论证关中不是独中，第三篇主要是讨论关中考统考的课题，其中的要点包括了统考是不是内部考试，及建议解决问题的程序。这里再补充一个关键处，即统考的法律地位与关中准考统考的批文，必须扣在一起讨论。

分析如下：

	法律地位	
	统考	关中考统考
1	口头承诺	口头承诺
2	口头承诺	准考批文
3	准办批文	口头承诺
4	准办批文	准考批文

上述四种情况中，第2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因为在逻辑上，教育部不可能批准关中去考一个连教育部都还未批准及承认的考试。只有统考获得正式的准办批文，关中才可能有正式的准考批文。而根据陆庭谕的说法，统考能以内部考试的形式存在，其实也是一种口头承诺。所以，这种情况下，关中是不可能会有正式的准考批文。事实上，不管是马华和方天兴的管道，还是邹寿汉经民政和中总及七大乡团的管道，都是得到同样的结果，即“

知道了”。所以，统考是政治上的存在，而不是法律上的存在。也就是说，只要政治形势有变，教育部也可以随时对付统考，不论关中是否有考统考。

就因为如此，叶派及其支持者死都要把统考和关中考统考的这两大议题切割开来。但不容易切割，所以，为了摆脱上述的困境，叶派又提出另一种说法，那就是统考是《1996年教育法令》规定下的内部考试，引用的关键条文是：

第 69 条：“有关考试的禁令”

.....

第 4 项：第 1 项不得施用于：

.....

(C)：“一所只为了评估本身学生而举行内部考试的教育机构”。

这个条文的关键字眼是：“教育机构”。董总是教育机构吗？首先，这个字眼“教育机构”本身在法令的第二条：“释义”里是有定义的，所以，我们不能以我们的一般理解去解释，也不能引用什么权威的字典来定义。而按照法令的定义，董总不是教育机构，这在我的第三篇文章里有较详细的论证，请参阅有关的部份。推广来说，教总也不是法令下的教育机构。只有学校，或者类似学校的机构，如补习中心，才能说是教育机构。事实上，当初翻译时，应该把它翻译为“教学机构”，才比较准确表达其中的含义。

那关中课题有解吗？这就取决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叶新田怎么看这个课题。从他的作为来判断，可以研判他是把关中课题当成是武器来运用，即关中能不能考统考其实不是他关注的重点，他关注的是如何运用这个武器来攻击对手。只要看透这一点，就会理解他的所作所为。叶新田在关中课题上，一共发动了三波攻击，第一波是对着魏家祥而来，注意不是整个马华公华，因为蔡细历的人马在博客上公开了批文的内容，暗助叶新田一臂之力。叶新田似乎也善于利用马华内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最后，这一波攻击以 1025 文告作结。由于很重要，特把 2012 年 10 月 25 日的董总文告要点摘录如下：

1. 据报导，“关丹中华独中”董事会决议遵从董总于 1973 年的独中办学模式；
2. 董总对“关丹中华独中”董事会的决议表示支持和赞赏；
3. “董总认为，只要关丹中华独中董事会坚持和贯彻这样的办学路线，到时其学生要报考独中统考应该没有问题。”。

到现在，我还没完全搞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文告出来。首先，这篇文告只有三段，每一段都有“关丹中华独中”的字眼，这表示关丹中华中学已被认定是独中。其次，文告指出只要遵从独中办学模式，就可报统考。虽然，有条件限制，但合情合理。简单讲，这是一篇皆大欢喜的文告。实际上，学务委员会完全可以根据这份文告作为起草整份报告书的基本框架。所以，约半年后，当叶邹二人对关中发动第二波攻击时，大家是很愕然的，不懂叶邹二人何又反悔。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是在策反彭亨董联会成功后，即把原本支持关中的班底排挤出去，全换上叶派的支持者，才发动攻势。

叶邹二人反对关中考统考理由，一共是三个要点：1. 关中不是独中；2. 统考是内部考试；3. 让关中考统考，对独中不利。在第一波攻击的前期只有第一个理由，所以，争论点就在关中是否独中上，这也是我前两篇文章为何要花大力气去厘清这个问题。第二个理由是在第一波攻击的后期才出现，而我本身对于本位主义的东西是没有什么好感，这也是为何我会写第三篇文章的动机。第三个理由则是在第二波攻击中才出现，而我写的第三篇文章也把这个考虑进去。

1207特大本身即陷阱

到了第三波攻击，则很明显是借关中课题来攻击内部的挑战派，即傅派及其联合阵线。因为，在叶邹二人的炒作下，谁替关中讲话，让关中考统考，谁就是汉奸走狗。明乎此，你就明白1207特大是怎么回事？

你想想看，为什么叶以很牵强的理由拒绝召开倒邹特大？当然是因手上的票不够，这是毋庸置疑的。那 1207特大，叶手上的票又够吗？当然照样是不够。那他反对给关中考统考，而自身所掌握的票又不够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有理由召开一个让关中考统考的 1207特大。头脑清醒的人，都看出这里面有鬼。事实上，1207特大根本就是一个局。其意图有三：1. 转移视线，模糊焦点；2. 贬低独中工委会的地位，摧毁学务委员会的功能；3. 1207特大本身也是一个陷阱，以下详论之。

假设1207特大开得成，不外是两个结果，一是通过，一是不通过。不通过，当然是叶新田胜。通过呢？那挑战派就会死得很难看。因为，正如前述，关中课题在叶邹二人炒作下，已经给人一个刻板印象，那就是谁给关中考统考，不是汉奸走狗，就是华教罪人。到时，叶新田就可借华社的强烈反弹情绪全面发动舆论炮轰挑战派，再进而乘势强力策反各州董联会，至少要让七个州的董联会换上自己人。董总的大楼说不定还会挂上两大布条，曰：“支持叶主席万岁”，曰：“打倒六人帮走狗”。所以，不管通过与否，叶新田都占尽便宜。特别是通过的话，他头上暗淡无光的董总主席光环，就会瞬间光芒万丈，谁挡谁死。

所以，1207特大纯属权谋，不是解决问题的正道。要解决关中课题，应如我第三篇文章的建议，那就是独中工委会这个管道。虽然，叶邹二人一直贬低独中工委会的地位，而且是从2008年开始有计划的做，但我要提醒一点是，独中工委会的地位与作用是有文献记载的，一是《董总卅年》，二是《董总50周年特刊》，这些都是董总重要的历史文献。如果，作为一个董总主席，竟然可以随意地否定自身的历史记载，那还有什么资格成为董总的主席。更何况，照独中工委会的组织章程规定，董总主席必然是独中工委会主席，也就是说叶新田本身就是独中工委会的主席，贬低独中工委会，不就是在贬低自己？

很多人以为马华可以轻易控制董总，那根本就是无知者之谈。像董总这样的华教组织，是很讲究论资排辈。这种组织上的伦理结构，加上董总组织章程的特殊设计，使得董总很难被马华所渗透，除非这种伦理结构受到破坏。那今天谁在破坏这种伦理结构呢？就是叶新田。从何时开始呢？就是从2008年，万家安攻击沈慕羽的那一篇文章开始。所以，叶新田越早下台，对董总的内在破坏就越少。

傅派倒邹不倒叶的盘算

那循着独中工委会的管道，是否就可彻底解决关中问题呢？坦白说，不容乐观。如果从解决问题的方向去处理关中问题，那就一定可以得到一个各方接受的解决方案。可是，正如前述，关中是叶邹二人用来攻击对手的武器，如果问题解决了，就不能用来成为攻击对手的武器。所以，他们二人怎么会让关中问题真正得到解决呢。

就算当形势对叶新田实在是非常不利时，他妥协让关中可以考统考，甚至放弃邹寿汉。但风头火势一过，必然伺机而起，始终是没完没了。最好的例子，就是1025文告，这篇文告即为解决方案，也是妥协方案。结果怎样，还不是不当一回事，照样对关中发起第二波攻击。

叶新田的妥协往往是另一场战争的开始。他的策略必然是这样，在中央打不过挑战派，就会使用拖延战术争取时间；与此同时到各州去开战，想方设法在至少七个州的董联会里换上自己的支持者。于是，华教内战，就从中央蔓延到地方。可以预计，华教内战，不止在全国版有新闻，在各州的地方版也会有新闻。事实上，这一场战争已经开始了，现在的森州董联会就是一个样板。

傅派一直讲倒邹不倒叶，是讲真的，还是讲假的？基本上，是讲真，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坐上主席的大位。事实上，挑战派不能一概归为傅派，傅派的基本盘只是玻吉二州而已，其他挑战派的各州董联会和他们是一种结盟关系。在倒邹上，大家是有共识。但如果倒田，就会出现一个问题，那就是谁坐上董总主席的大位。大家都是一方之霸，谁成为霸主，那是一个大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叶新田还有得玩的原因之一。

傅派的问题就是马华色彩太重，虽然除了陈国辉外，其他人很难证明是马华党员，可是他们的马华色彩就是很重。这也是为什么叶新田要把这场内战的主轴宣导为是对抗马华之战，这也确实影响了不少人的判断。这里要讲清楚，在华教里，马华党员和马华色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华党员不见得有马华色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上一任董总主席郭全强。郭全强是资深的马华党员，可是却看不出有任何马华色彩，甚至在任上还搞出一个“诉求”事件来，让林良实很头痛。这种例子很多，就不一一列举。

傅派也应该知道自身的马华色彩太重，不止社会大众不能接受，就算其他各地华教人士，也不见得能接受。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倒叶？他们的最佳策略就是掌握实权。事实上，傅振荃本身是秘书长，秘书处归他管，去年尾至今年头，又把叶系人马从秘书处清洗出来，换上自身属意的人选。

不过，这里又另有一说，那就是起始其实是邹寿汉想换掉叶系核心人马，其目的极可能是在为后叶时代作部署，等待时机成熟。只是后来事态发展，打乱了计划。这种传闻，不知真伪，也无从确认，但却合理地解释了为何叶新田权力捉得这么紧的人，却也会大权旁落。

中委会重选是最佳选择

总之，不管如何，以现在枱面上可以看到的行政人员的安排，傅系人马在内部已掌握了董总的实际行政权。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倒叶？倒邹就好了。推而论之，中委会重选也不会是他们的选项。手上有大牌，为什么要重新洗牌，对不对。

可是，综观叶新田上台以来，华教内战始终停不了。此人不下台，绝无了期。如果傅派不支持中委会重选，一方面会被人怀疑其动机，另一方面其优势也绝不会维持太久。坦白说，叶邹二人及其人马，建设无能，除了文告，还是文告，最多升级为“董总主席叶新田文告”；而所谓的大集会、所谓的签名运动，让无斗不欢者有兴奋一时之效，却无一寸建设之功。但非常擅于斗争，也乐于斗争，挑拨离间、古惑人心的手段更是一流，加上董总主席的光环，不容乐观。

所以，综合上述，我的意见就是一战决胜负，不管叶新田打烂战也好，还是摆出求和的样子也好，总之就是打倒底。所谓长痛不如短痛，中委会重选就是最佳选择，让董总于浴火中重生。

至于后叶时代的董总主席人选的标准或限制，也应该预先讨论，以安人心。我认为这个人选应该符合二个标准。一、不能有马华色彩，最好连马华党员也不是。因为，在后叶时代，重建董总形象必是第一要务，为了顾及社会大众的感观及避嫌，在此过渡时期，大家应有这样的共识。二、具有独中董事长的身份。理由有二，1 . 尊重惯例。近几任董总主席都是独中董事长，如林晃昇是尊孔独中董事长、胡万鐸是深斋独中董事长、郭全强是居銮中华独中董事长，就叶新田什么都不是。2 . 利益一致。董总主要业务就是处理独中事务，所以，由独中董事长担任董总主席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黄集初毕业于台大历史系，现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曾服务于独中 17年，现在华研担任研究员。

初探華教再出發

陳友信

華教運動面臨現世代的挑戰，要在堅守華教核心價值中 尋覓新道路開拓新境界。就這方面而言，我們不得不在自我反省中爭取突破。無人能諱言，今天的華教運動確是比不上林晃昇時代那樣“身處艱難氣如虹”。目前華教運動領導分裂，既缺乏兼聽則明的包容胸懷，又欠缺領導魄力與魅力；加上人才渙散，處境堪虞。

歸根結底，現今的華教領導是堅守原則有餘，突破創新不足；或者說“提倡有心，創造無力”。我斗膽剖析兩種思維狀態。

一、強烈的民族意識：經歷多年來政府單元思維的壓制及不公平對待，華社產生了民族悲情，這無可厚非，更是正義兼正常反應。在80年代，林晃昇等人領導華教從民主人權角度提昇鬥爭層次，進而嘗試以問政方式尋路，經歷和接受三結合的失敗，知難而進，轉而倡導兩線制，當時雖不見功效卻也奠下如今政治兩線制的理論基礎，更以事實闡明華教困境的終極解決方案，在於兩線制及政治制衡的落實。

今日新一代處在網絡時代，思維模式比較多元，不輕易接受民族意識的動員論述。這些網絡世代趨向世界公民意識，追求公平合理的大原則，講究素質績效。我認為華教必須儘快梳理新論述，不只從宏觀上強調母語學習的有效性，更得詮釋先進國家包容多元開放教育理念。我國華教既得重視中華文化的熏陶，更得突出華教素質教育的成功實證，成人成才的理念確是強調了人文素質兼顧實務的求學就職需求。

在這個教改領域（包括校園文化的塑造，統考的永續改進等），都不是個別表現突出的華校所能獨善其身，單身前進的。

二、圍城心態與藍海思維：不少華教工作者常說“華教運動的成功就是在狹縫中掙扎生存並成長”。掙扎生存必須自力更生堅守原則，但要續持成長就不能不開拓創新，與時俱進。

在目前的大環境中，國際多元開放思維風行於網絡時代，中國的崛起也提供華教成長的有利客觀條件。國家面臨政治兩線制新局面，政經文教進入轉型改革的陣痛，國內單元思維和宗教種族極端分子瞭解其橫行時日不多，故傾全力做垂死掙扎，其所發出的負面影響不容低估。

置此非常時刻，華教工作者切忌圍城心態。相反的，應專注於三大突破點，即：（一）跨

族群合作動員、（二）國際化行動、（三）將華教的華裔屬性提昇至全民教育，讓華小成為我國多元開放教育系統中可供各族人民選擇的教育系統之一。

當國家認為以國語為教學媒介的教育制度應是國民的首選，我們應以攻為守，提供華教為國民的選擇之一，這是符合我們多元教育原則的。環顧全球，確也有不少國家是讓不同媒介語的教育體系共存共榮的，如比利時的三語並存，瑞士的四語並存。只要國語作為共同溝通語必須在不同教育體系內成為必修課，各體系推動相同重點的課程綱要，再加上強化各源流學校學生共同的課外活動及各種交流的安排，這不正是我國多元教育工作者可努力的方向嗎？

相對於圍城心態的保守封閉，藍海思維或是目前華教工作者更寬廣的出路。就以非營利私立學校為例子，也有值得華教人士重新探索和借鑒。

目前許多人以為絕大多數的私立學校都是營利導向、高收費的，其實不盡然。就以我國伊斯蘭團體IKRAM所開辦的39所宗教私立中小學（學生總數近兩萬人）為例，這些都是非營利學校，採納國家課程綱要，另外附加本身規劃的宗教課程。如我國早期的教會學校及獨立中學也都是非營利的學校。

非營利私立學校在我國若被允許，除國家教學綱要外，也可以教導獨中課程，這或許是華教運動過程中不應自我放棄的契機。當然，華教運動的主要和終極目標仍然是爭取政府制度化增建華校，要求政府一視同仁公平對待各源流中小學，包括承擔各源流學校的行政與發展經費等。非營利私立學校也應得到一定的官方資助，我們可以借鑒台灣民辦教育的一些做法，即民間自主經營，但政府提供一些援助。

小結眾所周知，華教在本國依舊面對種種不合理、不公平的待遇。儘管如此，華教的發展並未就此止步。提出華教再出發，是一種主動和前瞻性的思考，審時度勢，善用大小環境的契機，主動規劃和執行，為華教開拓更為廣闊的前路。

（星洲日報 / 華堂論見·作者：陳友信·隆雪華堂會長）

初探統考新定位

陳友信

探討獨中的未來走向，就免不了需涉及獨中統考。從1962年至1974年，華文中學或華文獨立中學沒有一個特別為它們設立的統一考試，各校自己辦畢業考試和頒發畢業證書。

獨中既然是以華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自然需要一個華文考試來檢測其學生的學術水平。1973年底，《華文獨立中學建議書》的發表，為華文獨立中學確立了明確的辦學路線和方針；而舉辦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統一考試更是1973年《華文獨立中學建議書》的一項重要建議。為貫徹《華文獨立中學建議書》，董教總設立了董教總華文獨立中學工委會，在工委會下設立了統一的考試，讓華文獨立中學初中三和高中三的學生報考。

董總考試局的兩大任務：一是舉辦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統一考試，另一是建立與推行完善的統考評鑒管理制度。

經過這些年的努力，統考文憑完善的考試制度，以及其學術地位的建立，已然受到許多歐美紐澳等國的著名大學所承認，特別是世界排名領先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更是每年以優渥的獎學金“利誘”統考優秀生到該國就讀。

統考：從校內考試走向公開考試

當年林晃昇、沈慕羽等華教先輩在時任教育部長馬哈迪的公開威逼下，挺直腰，不懼囹圄的威脅，堅持創辦獨中統考，有勇有謀地突破獨中的瓶頸，奠定統考的合法地位，建立華教運動持續前進的堅實基礎。

所謂“統考是內部考試”的說法，實際上是當年政府試圖限制華教的一種說辭。當前一些華教人士卻作繭自縛，把說辭當定理，把不合理限制的“統考是內部考試”，當作是獨中的保護傘，劃地自限，甚至發出各種謬論。

其實只要對比劍橋校外考試機構的發展史，就能釐清此類保守言論的封閉性。今天的劍橋考試局是獨立於劍橋大學的考試機構，它甚至也提供各類校外學位課程，此舉並沒有對劍橋大學的校譽及招生產生負面影響。獨中的優勢必然是其中華文化特徵及素質教育。全國有大約三分一的獨中生在高二考完SPM後便離校深造，這雖有損華校的教育整體性，但卻是有關家長及學生的意願，學校除積極宣揚高三課程重要性，也得無可奈何接受這現實。而不少沒修讀高三的學生向來也以身為獨中生而自豪，一樣飲水思源。

獨中的優勢肯定不會僅是統考的機制及受承認度，同樣重要是其積極校園文化、人文素養、中華文化特徵、盡責師資及優良現代化教學設備及硬體建設。

統考是否是時候轉為公開考試，該探討的是下列兩個重點：（1）董總考試局對統考作為公開考試是否做好準備？是否有這方面的規劃和進程表？特別是應對國際專業化的考試要求。

（2）董教總獨中工委會是否有條件向世界，特別是東盟鄰國，推薦統考機制，並和當地華教機構進行磨合工作？

國際化的統考隨著中國的崛起，華文和中華文化的地位已不同往日。目前統考應有條件逐漸發展成國際的華文會考，並成為世界認可鑒定華文水平的公開考試。此舉將有助於帶動華文學習，成為國際上普通用語之一，同時國際社會也確實需要符合中文水平鑒定的“中文會考”。

統考的未來發展，可以朝向走出國門，踏足國際的長期目標，成為國際性以中文教學媒介的中學會考及大學預科課程。目前擁有統考文憑的學生都可豁免參加漢語水平考試，而直接入讀中國及台灣的各個大學，這顯示統考的華文水平早已受中國及台灣的認可。至於高中統考文憑，更已受歐美不下數百所頂尖大學接受為入學標準。

對比台灣的聯考，中國的高考，獨中統考在世界的認可度更高。

統考國際化，對董總跨入世界的教育與學術舞台是有利的。儘管我國政府尚未承認統考文憑，但當高中統考已經獲得國際學術或教育機構認定其為進入大學的重要鑒定考核標準時，政府到時或許也不得不放下政治的考量，來迎合學術無國界的客觀事實。當統考成為國際化的考試後，政府就將面對如何在承認並也舉辦統考的他國前“自圓其說”的苦衷。

放眼未來，董總考試局必然要繼續提昇其考試的管理、鑒定、批閱、審核、發佈等的制度化作業，以便為其國際化做嚴謹的學術把關。當國際上把統考列為國際考試的一環時，大馬的聲譽以至於董總的學術地位，必然在國際上大為提昇。

（星洲日報 / 華堂論見·作者：陳友信·隆雪華堂會長）

初探關中解決方案

陳友信

關中是一所註冊的私立中學；所有私立中學都得遵循教育部的課程綱要，並以國語作為教學媒介語。然而，關中的情況有別於一般的私立學校，這所學校從一開始就以吉隆坡中華獨中做為辦學模式，希望納入華教隊伍，並公開宣佈將以具體步驟實踐華教特徵。我們或可稱之為華文私立中學，就像伊斯蘭改革運動組織（IKRAM）所成立的私立宗教中小學，在國家課程綱要外，增加學校本身的教學行政特徵。

就歷史背景而言，關中確實稱不上是一所傳統獨中，因為獨中是我國1960年代教育政策變革的歷史產物，華教的特殊現象。

審視當今政治現況，除非重新修訂《教育法令》，或者我國政治出現重大變化，否則政府恐怕不會輕易允許增建獨中。

在關中的特殊批准過程中，包含了關丹華社甚至全國性團體的參與，其非營利性質再加上有關當局的政治考量，正副首相都曾公開口頭承諾不禁止關中除政府考試外也可報考統考，這些特殊情況讓華社為其定位議論紛紛，分歧不已。

這所華文私立中學（不是獨中，但也不是具有貶損意味的“變種國中”或不知所雲的“私立國中”），其模式可否視為華教運動中可待利用的狹縫，增加華校數目的突破口？讓華裔子弟得以在華社創辦的非營利華文私立中學，多些機會受華文教育及中華文化的薰陶。

華教領導可以集眾人之力監督關中的發展，思考華文私立中學也可報考統考的問題。若擔心此舉會導致統考當局被對付（而不是個別獨中），擔負不起這重擔，董教總也可召集全國華團大會，以眾力為我力，以華社為後盾。其實，在華教奮鬥的長河中，每一次的突破性運動，幾乎都是彙集群眾力量所促成的！

關中生考統考是“突破一點帶動全面”的起點？還是導致決堤的缺口？在華社厭倦此喋喋不休內部糾結一段時日後，難道不應廣招專家學者及華教各界人士對此課題進行集思廣益？回顧多年前新紀元學院獲得批文時，批文內強調僅能以國文為教學媒介。當時董教總領導層也曾再三廣召同道深入探討，分析研判各種可能遭遇的狀況及其應對策略，最終毅然先接受批文，再力爭出路，甚至議決開辦一些以中文為教學媒介的課程。回首來時路，這是有勇有謀的策略。

另外，寬柔中學古來分校的案例也可供參考。若拘泥於批文中沒有直接列明關中是華文獨

中，則可能因而自我阻塞了華教彈性發展的空間。

今日關中情況的確和當年新紀元學院被批准的情況不一樣，但客觀來說如今條件更為有利。正副首相在公開宣佈允許一所私立中學學生考統考後，斷不可能在短期內出爾反爾，以此治統考主辦當局的罪。董教總應和關中同道齊肩策劃尋求方案，以開闊的胸懷，歡迎關中加入華教隊伍。當然我們也得強調法治精神，客觀地評估任何解決方案的風險和後果，不可危害華教運動的長遠利益。

針對關中生考統考問題，我初步提出以下三個解決方案供參考：（一）以隆中華或其他獨中領養方式，允許關中生報考統考，這可視為過渡時期的權宜之計，但卻能讓關中生以及家長安心，此舉也有助於關中的招生；（二）董總考試局正式去函知會教育部關中生要報考統考，作為正式備案，若沒收到正式禁止函件，則公開進行之。若教育部來函表明不贊同，則那是個政治角力，華社當為後盾，另謀應對策略。（三）董教總獨中工委會與關中繼續以爭取在批文中列明關中生允許參加統考，全力進行爭取工作，若一日能獲得正式批文，不失為全國華教運動的劃時代突破。

目前關中課題呈現膠著狀態，內耗了華社的力量，分散了華教人士本應專注尋求突破，以及拓寬發展空間的努力，真令熱愛華教的民眾不勝心疼惋惜。在採取任何方案之前，應尊重董教總獨中工委會的專業操作，以他們的報告作為處理關中的主要依據。

在處理關中風波，華教領導若能掌握時代契機尋求華教運動新局面，進而領導華社擴大華教隊伍，包括讓更多華裔子弟，甚至友族孩子有機會受中華文化的薰陶，這種開拓性藍海思維，正是目前我國華教運動迫切需要的。

（星洲日報 / 華堂論見·作者：陳友信·隆雪華堂會長）

统考——契机与挑战

陈玉璇

近两年来，董总的内斗从暗流汹涌到公开决裂，让亲者痛仇者快。

姑且不论谁是谁非，两派裂缝加剧，恶斗白热化之转折点在关丹中华中学（关中）定位问题的浮现，而关中问题的症结，在于其学生能否参与统考。

统一考试，英文名称为Unified Examination Certificate (UEC)，简称《统考》，作为马来西亚独立中学重要的身份表征之一，其地位获得华社内外，乃至国际间普遍认可。

回顾历史，上世纪60年代，政府因应《1961年教育法令》的实施，停止为华文中学举办会考。为了填补这空白，1975年董教总顶着来自当局的巨大压力，以一己之力成功举办第一届高初中统考。

全马60间独中以华文为教学媒介，固然需要一个华文考试来统一鉴定其学生之学术水平，并作为独中毕业生国内外升学或就业的依据。

对不公施政的强烈回应

但，统考不仅仅是一个为独中生而设的考试而已。当年，董教总成立独中工委提出统考，是对当局不公施政的强烈回应，如在困境中点起一盏明灯，凝聚了华社各界的力量，也激发并证明了自身的能力。

一个资格考试的举办涉及多个领域，董教总也因筹办统考，连带独中工委（董总行政部）的发展日益壮大、完善。

而后，统考以超过200间世界各国大专院校的接纳，让独中生跨出大马，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在专业方面，统考也领先了政府考试，例如为华教人士所津津乐道的，统考比公办考试，提早好几年落实了网上查询成绩功能。

统考货真价实的高含金量，赢得了家长的信心，鼓舞了无数的华教工作者。统考巩固了独中的生存，成为华教向前发展的要素，是族魂林连玉先生名言“对付破坏的最好答复就是建设”之最佳写照。

统考应面向所有受华文教育者

众所周知，统考或华教的发展，是在夹缝里成长、茁壮。早年，当局打压不成，为了限制统考，口头上将其定位为仅限于独中生参与之内部考试。这虽然是限制，但也圈定了统考得以继续举办的安全范围，董教总及华社也就被动得接受这样的定位。

近年来，随着中文日渐获重视、华校素质不断提升，华教发展理应较为顺遂，然而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国内社会政治局势日趋复杂，现实中华教前景仍有不确定性。关中横空而出，正说明了这变化难测的状况，也带出了关中生能否参与统考的争议。

如果说统考是为了华教而办，那统考应该面向的，是所有的受华文教育者，不论是来自独中、国民型中学、私立中文学校乃至其他。倘若开放于60间独中以外的学生参与，意味着统考将跨出以往的安全范围。然而，这安全范围是否真的安全？

反对统考开放的理由，不外乎担忧面临当局的打压，影响未来统考的举办，及独中将失去其独特的身份印记，竞争力被削弱等。

滞留舒适区将失应变力

华教历经百年风雨，早已站稳脚步，获得甚至华社以外的认同，逐渐摆脱悲情。虽说关闭华校言论仍不时冒出，但已难激起火花。

回顾历史，华教前辈们也经历许许多多的风险，筚路蓝缕，开辟出华教壮阔天地。跨进关中，统考之路才能更显宽敞，华教发展也将获得更多的回响。因此，华社不能因风险考量而画地自限，应该谨慎而不自满畏怯。

在舒适范围里感觉良好，会导致对外界变化反应能力的丧失，一旦面临无法回避的挑战，自身体系将会迅速溃散。

华教的危机意识，是一把双刃刀。统考固守城池，是否有助华教进入马来西亚社会眼中的主流教育？还是促使独中走向边陲？

另一方面，母语教学与统考为独中最鲜明的身份标签。然而，如果独中仅能以统考来阐明身份，或只能彼此依存，那不论对独中或统考而言，都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利的。

每年华社倾注大量的人力财物发展华校，当中尤以60间独中获得最多资源与关注，每年独中工委也专为独中生举办统考。

社区需要催生关丹中华

华社把独中视为重要的文化传承之载体。然而教育不应只顾及特定群体需求。独中不应只为华社而办，统考服务的对象也应该是所有需要统考文凭，能以华文应试者。关丹华社对一所华文中学的强烈要求，加上难以获得独中办学执照，主客观原因导致私立

关丹中华中学的诞生。这显示华校存在的理由，除了以往我们所认同的民族传承、基本教育权，还有催生关中的社区意愿。

14年前，白小事件里，“社区需要华小”诉求喊得震天。同理的，关丹华社需要一间华文中学的诉求，应当被接受。因此董教总举办的统考，没有拒绝关中生的理由。

当然统考逐渐开放，的确会让独中面临竞争压力。但独中的优势，不仅仅在母语教学及统考。母语教学及统考是独中特有的传统，也是历史因素造成。

社会普遍接受独中，重视的是独中整体的办学，这包括了认真与多语多元的教学、严谨的校风、学生人格的形塑、杰出的学术表现等，简单来说即德育体群美并重的教育，及因应现实变化的灵活调适，如双轨制、教改等等。

私立与国际学校的竞争

独中面临的竞争与问题，也并非限制非独中生报考统考就能解决。

近年来，独中急速扩展，但仍满足不了家长对其学额的需求，独中如何兼顾质与量成为首要任务。独中的竞争对手也不再只是政府学校，也包括如雨后春笋般设立的私立学校与国际学校，这类型学校在面向国际、校址与师生的选择方面有优势。由于大部分的私立与国际学校之课程皆由学前教育开始，这等于把竞争起点往前推进了，而华校无法提供由幼小至中学的一条龙课程。

因此统考面对的，不再只有政府公办考试，而是IB、IGCSE、A level或其他国际同等资格考试。长久而言，私立与国际学校的学生容量比60间独中来得大，显然统考生在高等考试考生人数的份额会逐渐降低。若统考报考人数基础增加，对统考也是正面的。

统考注入新思维面对变化

目前华教面临的挑战，除了单元文化霸权，更直接的是不同的教育制度。统考不应该承载过多的历史责任或族群色彩，应该走向更专业。实力坚固的统考，将更具竞争力，经得起更严峻的考验。

近年来，马来西亚社会与政治各领域的发展，已转入新的层面，不同以往。旧政治虽未崩解，但已见松动。

拥抱旧体系不必然安全稳定，华社上届大选已选择面对改革，统考或华教，也需注入新思维面对变化。

统考走过了40个年头，是大马华社引以为傲的成就。常言道四十不惑，是时候华社重新定位统考，让统考带领华教走入新的阶段。

再论关中争议

黄集初

【时政】天下未集

关于关中的议题，本人去年已写了一篇：《[第61所独中乎？——论关丹中华中学](#)》（以下简称“论关中”），过后又补了一篇：《[第61所独中乎？（补编）——历史协议论](#)》（以下简称“协议论”）。后来，有关的议题，在2012年10月25日，董总发表文告之后，就平息了下来。当时董总声称只要关中董事会坚持和贯彻董总于1973年制定的独中办学模式，“到时其学生要报考独中统考应该没有问题”。

到了本年度5月中旬，董总在劳勿向当地华教工作者进行汇报时，坚持关丹中华中学不是独立中学。随后，关中校长詹耀辉反击，指责董总发表“不实言论”，打压关中。于是，一来一往，关中议题又再炒得沸沸扬扬。不久，教总又加入论争，形成华教大论战，可谓是“新纪元事件”的升级版。

摒弃推论标签化现象

本来，有论争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如果依据事实及逻辑来辩论，反而有助于厘清事情。可是，这次的论争出现了太多情绪性的字眼，如“变种独中”、“私立国中”、“私立马来中学”、“私立国民型中学”、“私生子”等，甚至也出现人身攻击的字眼，如“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见董总2013年5月22日之[文告](#)）、“华教逃兵”等。

此外，论争也出现了一些推论标签化的现象，如马华是腐败的，所以，凡是和马华沾上边的人所讲的话都不可信等，这种毛病不止一般人，就连有些评论人也免不了，完全忽略了人的多面性及事件的复杂性。这种推论标签化再严重，就造成恐惧代替了思考，情绪凌驾于理性之上，争论就只有越来越激烈，以致不可能调解。

因此，要厘清关中争议之前，思想上要有几点的准备。首先，在逻辑上，推论标签化一定要摒弃，这也包括纵使过去是对的，也不保证现在及未来也是对的；其次，在情绪上，没有具体的依据，就不要轻易地把问题拉到华教存亡的层次，否则极易陷入把对手视为敌人、异己视为叛徒；三则，在说理上，地位不是理由、权威不是真理。没道理的，固然不用去支持，不讲道理的，更不值得去维护；最后，为了下来讨论的方便，这里把凡是坚持法律明文规定有的才算有、没有的就是没有，一概以白纸黑字为准的观点或主张，称之为“成文主义”。

由于有太多争议点，就只针对几个争议点，条列如下，逐一提出一些看法，以供各位参考。

法律上并未存在独立中学

一、何谓独中。正如“协议论”一文所述，不论是《1961年教育法令》抑或《1996年教育法令》，都没有“独立中学”这一名称，即在法律上，“独立中学”是不存在的。

“独立中学”实是源自于《1960年达立报告书》。在《1961年教育法令》下，“国民小学”、“国民型小学”、“国民中学”和“国民型中学”都有明确的定义。其中，“国民型小学”到了《1996年教育法令》改称为“国民型学校”，而“国民型中学”则取消了。

华教界一些成文主义者常以《1996年教育法令》来证明“国民型中学”已经不存在了，如以此类推，那“独立中学”在《1961年教育法令》之后也同样的不存在了。

事实上，就算成文的法律也常有的模糊之处。如《1961年教育法令》中，并没有对“私立”二字下过任何的定义，但却出现了第40条：“有关私立学校及机构的保留条款”。到了《1996年教育法令》就比较清楚，私立学校或私立教育机构是定义为：“不是政府开设或资助的学校或教育机构”。如此一来，独立中学就应该落在这个范畴内。

在这里，教育机构是指什么呢？不管上述那一个法令，教育机构都包含了学校在内，以及学校形式以外的任何教学形式组织，总之，就是要有教学的活动，所以，董总不能视为是一所教育机构。独立中学不管怎么看，都不可能是属于学校形式以外的教学组织，如补习中心之类，所以，独立中学可以进一步推定为属于私立学校的定义内。如此一来，就带出另一个问题，独中的教学媒介语、课程及考试是否可以自主呢？

国家规定课程与考试

二、国家课程与考试。在《1961年教育法令》下，只是规定国民中学是以国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及国民型中学是以英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两者都必须“为学生准备参加所规定的各项考试”。对于其他类型的学校，就没有任何明文的规定。

到了《1996年教育法令》就大不同了。第17条：“国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规定所有的学校及教育机构，国语必须是主要教学媒介语，除非获得部长的豁免。第18条：“所有学校必须采用的国家课程”的规定下，所有学校都受这个条文的管制，而且没有豁免的条款。第19条：“学校必须准备学生参加所规定的考试”，同样的，所有学校都受到这一条款的管制，除非得到豁免者。第74条：“私立教育机构必须必须遵照国家课程的需要，并且准备学生参加规定的考试”。

所以，《1996年教育法令》就是一把悬在独中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看什么时候掉下来而已。

那独中到底有没有在《1996年教育法令》下得到豁免？据闻，没有任何白纸黑字的批文豁

免独中不受相关条款的约束。至于口头保证，至少首相及教育部长的口头保证肯定没有，马华部长的口头保证，则要查一查。就算得到豁免，可是因为第18条没有豁免的条款，独中是否可不采用国家课程呢？这还是一个疑问，需要法律专家来分析。所以，独中现在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法律状态呢？对于成文主义者来讲，难道这不是一个比关中批文更严重的问题及危机吗？

由于第17至第19条的规是适用于所有学校，私立学校当然也不能例外。关中从申请的表格及批文来看，毫无疑义是私立学校。但也不能说人家是“私立马来中学”、“私立国民中学”、“私立国民型中学”等，这绝对不通。如果这可以成立的话，全国的所有私立中学都是“私立马来中学”、“私立国民中学”、“私立国民型中学”。

而且世界很多国家的私立学校，如果课程和考试都是国家所规定的课程和考试，那也都可以改称为“私立国立学校”。在解决争议时，这些无谓的字眼都不应该使用，除非本来的目的就是要吵架。

“宽柔模式”的前提

三、宽中申办分校模式。因为关中论争，“宽柔模式”这个字眼又红了起来。坦白说，身为校友，还是第一次听说有“宽柔模式”这回事。不过，宽中竟然可以不受“关中模式”的影响下，申请到第二所分校，那么我们就分析下这个“宽柔模式”是怎么回事。

归纳下，“宽柔模式”有两个前提：1.特殊的良好关系；2.自身的份量要够。所谓特殊的良好关系，当然是指与有关执政当局有非常好的关系。首先，自然和马华公会的关系要非常好，对宽中而言，这绝不是问题，因为董事会里有不少资深马华党员。其次，和巫统的关系也要非常好，就比如这次申办第二分校的申请表格，是由巫统新山国会议员沙里尔亲自交给首相纳吉，而且副首相兼教育部长慕尤丁也没有说任何扫兴的话。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首相是不可能绕过教育部长直接下达指示，因为我国是内阁制，部长的权力是受到法令的保障。如果，部长不听首相的指示，首相唯一的做法就是开除有关的部长，亲自兼任有关部门的部长一职。但在这件事情上，如纳吉这么做，就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所以，关中也好，宽中第二分校也好，不可能绕过教育部长。

宽中具体是如何做，我不清楚，但关中这一事件上，肯定没有处理好与教育部长的关系。总之，就是一句话：“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

而所谓自身的份量要够，这就不言而喻了。华教问题本来就是政治问题，而政治是讲实力，有实力就得谈，没实力不止没得谈，还会乘势吃进来。从绝对数量而言，宽中本身的学生人数约1万人，加上5所小学，合起来就超过2万人，把这些学生的家长和其亲朋戚友算进来，直接间接地与“宽柔”二字扯上关系的，说有20万人也不为过。从相对比例来说，全国在籍独中生约6至7万人，宽中生就占了约1万人，这也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

低调模糊创造出空间

以上是前提，下来论申办形式。增建独中最大的问题是独中的法律地位是不清晰的，政策上也不鼓励，所以不存在任何独中申办条例。所以，在我国法令及政策没有重大的修订及改变下，要增建独中绝对不可能走成文主义的道路，只能想方设法创造出一个模糊空间，然后，在这个模糊空间里“弄”出一所独中来。

宽中就是采用“增建校舍”（Bangunan Tambahan）的“形式”，“增建”出一所古来分校（Cawangan）。（陆庭谕说是“Sekolah Tambahan”，其实是不对的。）从文字上来说，增建校舍怎么会等于增建分校呢？

所以，如果从成文主义的观点出发，有关当局也可以随时采取行动对付宽中的，因为批的是“Bangunan Tambahan”，可是实质上却搞出一个“Cawangan”来，根本就是名不副实。可是，有关当局却又批了第二所分校下来，至于这次的批文是如何写就不得而知，极可能又是“Bangunan Tambahan”。不过，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相信宽中董事会绝不会公布有关批文的详情。

总之，宽柔模式的启示就是，只要自身份量够，谁怕谁。此外，还有一要点就是绝对要低调，因为本来就是利用“模糊”去创造出一个空间来，如果高调进行，那要如何来模糊？顺便强调一点，“关中模式”并没有成为宽柔第二分校的样板。所以，“关中模式”并不必然成为今后所有申办新独中的模式。

最后，就是时机。最佳的时机自然是大选前，因为整个宽柔模式是建立在国阵的恩庇体系上，其精神就是“You help me, I help you”。

所以，综观整个宽柔模式，如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乖巧的小孩有糖吃，吵闹的小孩就不用想有糖吃。如要坚持“堂堂正正增建独中”，那就不可能采用宽柔模式。

还有一点，也是宽中的先天优势，那就是宽中是第一所宣布不改制的华文中学。有这一层光环罩住，就算有可议之处，也确实有可议之处，但也没有那一个“外人”敢随意地公开批评。就算批评，也是客客气气。

董总不提第一次呈文

四、方天兴与第一次呈文。方天兴是否负有“特别任务”？这是很多人心中盘旋不去的大问号，我也没有什么内幕消息，所以，只能从双方文宣及媒体报导所得资料来加以研判。

在这里，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方天兴如何介入关中事件。我们先看下董总的《关丹中华中学批文争议专辑》（以下简称《批文争议专辑》）的大事记一览表，特摘录如下：

1960年代初	彭亨8所华文中学改制，关丹中华中学3年后停办。
1999年10月31日	“关丹复办独中工委”成立。
2011年初	一发展商献地。
2012年5月20日	520大集会
同年7月26日	教育总监移交批文予隆中华
同年8月18日	隆中华披露，批文有问题。之后，批文在部落格曝光。

据大事表，看不出方天兴是如何介入，于是只好翻阅之前的剪报资料。资料显示，关丹中华中学的申办过程中，一共有两次呈文，在第二次呈文时，才获得批文。由于，大家把争议点放在批文上，以致勿略了还有第一次呈文。其过程列表如下：

2009年9月27日	方天兴当选华总会长。
同年11月22日	方天兴表示与彭董联合会配合，争取关丹复办独中。
2010年1月22日	复办独中工委重组，主席由方天兴改为黄道坚。
同年3月09日	五大华团圆桌会议达10点共识，盼速准复办关丹独中。
同年7月02日	乘首相出席彭华团联合会活动，方天兴等向首相呈文，纳吉反建议以分校方式申请较适合。
同年7月27日	董总等“密谈”关丹复办独中，三方(注)“相亲会”达共识。
同年8月24日	叶新田证实，隆中华负责申办关丹分校。
同年8月29日	在方天兴带领下，正式移交申请书予首相纳吉。
同年9月01日	隆中华向教育部提呈申请书。

注：三方是指董总、彭亨董联合会及隆中华。据报导，叶新田被形容为重要的“媒人”。

与董总的大事记做一对比，就可发现董总的大事记完全不提2009年至2010年的第一次呈文的过程。事实上，据当时的报导，华社对关丹能够复办独中是很乐观的，主要原因就是基于方天兴与首相纳吉有“良好的关系”。

在那时，没有人怀疑方天兴有“特别任务”，包括董总在內，而且还合作愉快。就算到了520大集会，双方的关系还是良好。直到慕尤丁挑起了“历史协议”的议题，马华被董总扣上“典当华教”的恶名后，董总与方天兴之间的关系才逐步转恶。

归咎方天兴的数疑点

当时马华为了摆脱“典当华教”之恶名，就急需办出一所“独中”来给大家看，于是就有了第二次的呈文。在这个过程中，马华就起著主导的作用，而董总则排除在外。等批文出来后

，董总要求公布，这时方天兴就讲了一些话，如“批文我看过了，没问题”、“见好就收”等。后来，批文曝光，方天兴就因这些话而满身蚁，也因此被怀疑负有“特别任务”。不过，如果说方天兴负有“特别任务”的话，尚存有几个疑点。

第一，董总是有参与第一次呈文。因此，我们自然就会问一次呈文和二次呈文有何差别？是否走样了？正如“论关中”一文所分析，呈文和批文是密切相关。如果，一次呈文和二次呈文的关键内容没有什么差异，就很难理直气壮地指责对方“出卖华教”。所以，第一次呈文的内容也应该公布，以昭公信。

第二，隆中华会与关中扯上关系，是由董总主席叶新田从中牵线，虽然在董总的《批文争议专辑》里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但当时应该是关系良好。可是演变至今天的情势，隆中华反而联合吉隆坡其他三所独中叫板董总。如果说是完全因为方天兴的关系，实在令人难以相信。

第三，在《1996年教育法令》下，有关当局已经有充份的法律依据对现有60所独中的教学媒介语、课程及考试等采取行动，还需要如此大费周章借关中批文来对付独中吗？反而，华教大分裂让有关当局更有可能采取行动。所以，批文的内容不是重点，反而因为批文的争议所带来分裂才是问题。但更严重的问题是下来的第四点。

第四，在1962年华文中学改制后，有关当局就把矛头对准华小，处心积虑地要华小变质。华小的三大问题：师资不足、拨款不足及分布不均，从70年代开始就已经存在了。间中还发起促使华小变质的攻击，举其大者如华小高职事件，宏愿学校、数理英化政策。而眼前的就是《教育大蓝图》下的华小国小化。站在有关当局的立场来看，只要解决了华小，10年8年后，独中就自然而然地解决。难道是方天兴故意在这个时间点上挑起批文的争议，以转移大家的视线？

第五，最新的指责是指方天兴在2012年初与叶邹二人会面，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在关丹设立一所国民型中学分校、将东马微型独中搬迁至关丹、开办国际学校及建议设立一所新模式的中学等。由于会面无法取得共识，因此董总才主催“520申办关中和平大集会”云云。可是据报导，520大集会是：“由陈玉康局绅提出，日前陈氏以个人名义致函给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并要求董总协助发动，经过董总同意发动及担任主催单位后，交由彭亨董联会举办”（星洲日报，2012年4月20日）。

双方会面及方天兴的各项建议应该是没有多大的疑义，但如果说提建议就是有“特别任务”，那就太多人有“特别任务”。至于说由于无法取得共识，而主催520大集会，就和报导有冲突，更何况方天兴当天也有出席大集会。当然，有人说这是方天兴借机介入关中课题，掌握领导权云云。这显然不对，因为方天兴早在2009年就介入关中课题了。

以上的五点，是需要更多的讯息来厘清，这里就不好妄下结论，只好存疑。

董总与关中立场比较

五、双方方案之比较。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大选未到之前，修改批文是不可能，重新申请也不可能，而下届大选至少是3年后的事情，除非现有的政治结构有重大的变动，比如巫统分裂。其次，就算靠近大选，修改批文也好，重新申请也好，也不保证行得通。如果，华教分裂的话，那什么都不用谈。

所以，现在所谓退回批文就是等于不用办校。退回再重新申请，那不如等换了政府再说。那什么时候可能换政府呢？至少也要到下届大选才有可能，除非现有的政治结构有突发且重大的变动。所以，眼前对于批文，就只有要或不要，修改也好，重新申请也好，都不用浪费力气去争论。

双方的基本立场如果打个比喻的话，就是有一对情侣准备奉子成婚，有的主张除非得到家长的明确同意，否则就不可以结婚生子；另一方则主张先把生米煮成熟饭，孩子先生下来，才来争取家长的同意，因为孩子不能等。前者可概括为“成文主义”，后者可概括为“先上车主义”。本来是可以各说各的，各做各的，但就是因为“统考”而绑在一起，形成必须二择一的局面。

但如此争来吵去是没有太大的意思，因为不管怎样，都不能迴避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双方的立场都必须建立在对当前政治情势的判断及预测。对当前政治情势有不同判断及预测，就会有不同的做法。

以“宽柔模式”为例，就是认为当前的政治结构不会有重大的变动，所以就不正面挑战有关执政当局，更不会要求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堂堂正正地增建分校，而是采取迂回模糊的手段以达最终的目的。

现在，虽然双方是没有清楚地阐述对当前政治情势的判断及预测，不过，根据双方发表的言论来判断，关中这边应该还是比较接近“宽柔模式”的预测。而董总在攻击对方的方案时，就很悲观，似乎独中及统考随时会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主张自己的方案时，就很乐观，似乎有足够的实力可以给予有关当局足够的压力，逼使有关当局做出让步。所以，实在推断不出董总自身的判断及预测是什么。

这里不评论那一个方案比较好，因为对政治走向的预测不在行。但基本上这是一个策略选择的问题，大家可以针对不同政治走向预测，研究各个方案的利弊得失，再综合起来做个决定也不迟。

无必要召开华团大会

六、华团大会。据报导，董总准备在7月初召开“华团大会”。从战后以来，华团大会、座谈会或华团盖章运动是进行了几次，但似乎没有为了华教的内部纷争而召开。请看下表：

序	年份	主题	抗争对象
1	1956	争取公民权大会	有关执政当局
2	1977	四千华团响应独大盖章运动	有关执政当局
3	1981	华社对3M制的四点要求	有关执政当局
4	1985	《全国华团联合宣言》	有关执政当局
5	1987	华小高职事件及全国华团政党抗议大会	有关执政当局
6	1995	《1995年教育法案》（注1）	有关执政当局
7	1999	《马来西亚华团大选诉求》	有关执政当局
8	2000	“宏愿学校”危机全国巡回汇报会	有关执政当局
9	2002	各源流学校数理英化事件	有关执政当局

注1：《1995年教育法案》在1996年通过，是为《1996年教育法令》。

注2：整理自董总网页。

这次的关中批文事件可以和上表中的事件等量齐观吗？坦白讲，为关中批文召开华团大会，实在没有这个必要。其实，这可以透过内部的机制来解决，下面会再详谈。

统考归属独中工委会

七、论统考。首先，统考是归属于谁？一般人会回答是董总，其实这是不正确的答案。正确的说法是归属于独中工委会。

独中工委会成立于1973年，其成员包括董总委任的13位代表，教总委任的13代表及在第一次联席会议委任的13至17位代表。独中工委会底下又设立各种委员会，其中就有统一考试委员会。此外，还有一个执行单位：秘书处，其下设立各局，其中一个就是考试局。

独中工委会的组织细则还有一条规定，即董总的主席、总务、财政是独中工委会的当然主席、总务、财政，而教总主席是独中工委会的当然署理主席。所以，董总可以说是独中工委会的主导者，但不能说董总就等于独中工委会。因为，教总也是“大股东”，不止有资格说话，还有决策权，不是董总说了算。

其次，何谓统考承认？一路走来董教总向有关当局争取承认统考，只是针对统考文凭的持有者，并没有包含争取统考成为对外开放的公共考试。在早年设立统考时，就有讨论过这个开放的问题，最后决定暂不开放。至于教育总监警告不能开放那是后来的事情。现在董总最新的立场是争取统考成为对外开放的公共考试，这到底是真的想争取，还是将对手一军，则不得而知。

不过，对于现有的纷争还是没有任何实质的帮助，因为问题还是一样，关中这一方一定会要求先准考统考，再一边争取统考成为公共考试，而董总这一方必然坚持先成为公共考试

，才准关中考统考。所以，只是把“批文”改为“统考”，争执的模式还是不变。

三则，统考受法令限制的问题。这是《1996年教育法令》后的事情，之前并没有任何法令约束统考成为公共考试，所以，从1975年起至1995年的20年间，统考只是一种内部的考试，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形势所迫，其次是内部有不同的意见。直到《1996年教育法令》后，才有相关条文的约束，即第65条：“有关考试的禁令”。

在该条文下，除非得到考试总监“事先的书面批准”，否则不得举办任何形式的考试，除了“一所教育机构的内部考试”外。而在第65条下的第3款很明确地说明所谓的举办考试，包括招收考生、缴费、拟定课程大纲、评阅、授予文凭等。所以，想把统考解释是一所教育机构的内部考试是不可能的事情，也就是说统考的举办须得到考试总监的书面批准。

那董总有拿到这样的书面批准吗？据了解是没有，也就是说当政治情势对有关执政当局有利时，随时可以禁止统考的举办。从成文主义的观点来说，这难道不是一个比关中批文争议更严重的危机吗？

启动独中研讨的机制

八、解决机制。正如上述，统考是归独中工委会管，所以，解决的机制应该是到独中工委会上议决。不过，如此高度争议性的议题，就算独中工委做了决定，也会受到反对者的强力挑战。但不管怎么，问题总归是要解决，所以，我们考察过去是怎么做。统考史上有两大争议，一是统考开放的议题，另一是统一考试媒介语的议题。这里就只观察统考开放议题的讨论及议决的过程。请看下表：

序	日期	会议	议决
1	1979年4月8日	第2届独中行政人员研讨会	暂不开放。
2	1981年2月22日	独中工委会与统一考试委员会联席会议	未达共识，暂缓决定。
3	1981年3月14日	独中工委会、统一考试委员会、独中董事代表与校长扩大联席会议	统考旨在为独中生谋求出路，且也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故继续不开放。

注：整理自董总网页。

到了1993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冯镇安呼吁开放统考，社会舆论也随之呼应开放。其时，独中工委会考试局发表文告表示：“将独中统考这项内部考试转变为公共考试，涉及教育法令、教育政策和独中工委会内部操作问题，现阶段不可能开放”。自此以后，统考开放的议题就平静了20年。

在这里，补充下独中行政人员研讨会的资料，其全名为“全国华文独中行政人员研讨会”，出席者除了各校的校长、行政人员之外，其实也包括了各校的董事及各州董联合会的代表。至今只举办过4届，请看下表：

历届全国华文独中行政人员研讨会一览表：

序	年份	届数	主题
1	1976	第一届	集思广益，制订振兴独中方案。
2	1979	第二届	深入讨论数理课本媒介语问题。
3	1983	第三届	针对《独中建议书》实施10后作总检讨。
4	2003	第四届	探讨独中在21世纪的发展及愿景，提出《独中教改纲领》。

注：整理自董总网页。

以上就是过去董教总解决华教内部重大争议的机制，而这些机制都还在，为什么不重新启动呢？况且，独中行政人员研讨会从第四届至今，也过了10年，其实也是时候召开第五届全国华文独中行政人员研讨会，探讨308之后的大马政治形势下的华教发展的课题，也为当前的纷争与机遇交流意见、凝聚共识，更同时为《独中教改纲领》提出后10年作一个总检讨。

然后，再顺势召开独中工委会与统一考试委员会联席会议，甚至扩大会议来解决关中及其所引起的相关议题，这不是比召开什么“华团大会”更好吗？

华教攸关政治的博弈

总而言之，华教问题的本质是政治博弈的问题，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斗争的终极目标是发展华教，不是守住华教。更重要的是，华教原初的本意是以全体华裔子弟的母语教育问题为奋斗的目标，发展及守住独中是在当时的形势下迫不得已的选择。现在却因为关中批文之争议，整个华社因为“独中的存亡”，不止忽略了发展华教的机遇，也完全忽略了眼前华小国小化的危机。

自308之后，本国整个政治形势剧变。本届大选后，国阵不但拿不回三份之二的国席，还第一次得票率低于50%，而马华也差不多了。这与过去，甚至中学改制时的政治形势完全不一样了。如此大好的形势，我们的华教领导却下了一盘烂棋，真令人感慨啊！

主要参考文献：

- 1.董总网页。
 - 2.董总，《董总30年》。
 - 3.董总，《董总50年》。
 - 4.董总，2013年，《关丹中华中学批文争议专辑》。
 - 5.程材，2012年，《[关于“独中统考”的若干历史问题——兼论关丹中华中学参加独中统考的问题](#)》。
 - 6.《星洲日报》2012年4月20日报导“争取关丹复办独中，彭董联520和平请愿”。
- 黄集初毕业于台大历史系，取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硕士，曾服务于独中17年，现在华研担任副研究员。

E. 新闻报导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option=com_k2&view=item&id=61218:4&Itemid=113

邹寿汉「青蛙图」反击 指责4独中是吴三桂

《东方日报》2013年6月20日

（吉隆坡20日讯）董总署理主席邹寿汉今日发表《新吴三桂引「青」兵入关》的漫画，指责吉隆坡4所独中力挺关丹中华中学，并表示隆4独中本应与董总站在一阵线捍卫华教，但却甘于被利用，把矛头指向董总。

这张以《新吴三桂引「青」兵入关》为名的「青蛙图」，也指董总会继续捍卫民族母语教育，坚守华教血肉长城。

所有中文媒体今早收到董总发出的图片，图片显示3只骑在马匹上的青蛙手拿著长矛，分别打著「中、尊、循、坤」的旗帜，带领一批青蛙，准备冲入一座长城。其中排在中间的一个青蛙骑士，看似一匹皮肤像青蛙的马。在这3匹马的背后还有一双负责扯线的双手。

在长城上，所有青蛙都手持盾牌。盾牌上写著母语教育、独中、华小及幼儿园，墙内青蛙对著墙外青蛙叫嚣。

邹寿汉接受《东方日报》询问时，表示这幅图是要回应吉隆坡中华独中、循人中学、坤成中学及尊孔独中董事会的联合文告。

他说：「4所独中本应和董总站同一立场维护独中，现在跑去对方阵营，这幅图是个暗示。」

4所独中董事会6月13日针对关丹中华中学事件发表联合文告，他们认为华教界当务之急是协助关丹华社，依循董教总独中办学路线，把争取已久的关中建起来，同时争取厘清批文争议。

「青」字是指华团

邹寿汉并不否认「青蛙图」也是针对支持「边建校边改批文」的华团。「这幅图后面还有很多青蛙，但总不能把所有团体名字都放在内。」

他解释，「青蛙图」命名为《新吴三桂引「青」兵入关》，「青」字表面指青蛙也是指华团。

「至于负责扯线的手，你要说是指政府、教育部长丹斯里慕尤丁或巫统都可以，总之关中事件是有人在背后操纵。」

董总将在本周日（23日）举行董总代表大会，邹寿汉不否认「青蛙图」是一个铺陈，也是延续昨日对关中董事长丹斯里方天兴发表的8页公开信。

「昨天用文字讲了，今天用图片讲，可能更有吸引力。」

邹寿汉去年11月18日也曾发表一副「温水煮青蛙」的图片，暗喻董总目前孤军作战，并呼吁昔日战友要归队。当时董总正在筹办反对《2013年至2025年国家发展大蓝图》的「1125和平大集会」，但教总当时公开表示不参与大集会。



董总署理主席邹寿汉发表的《新吴三桂引「青」兵入关》漫画。

<http://www.malaysiakini.com/news/148930>

新闻来源： 2010年11月23日《当今大马》

举报林连玉基金为非法组织，兴汉社促查是否涉及欺诈案

董总与林连玉基金的矛盾尚未化解，远在怡保的马来西亚兴汉社却插上一脚，其顾问岑启铭今日在怡保报案，举报《林连玉基金》为一个非法组织，并声称发觉一些不负责任的份子利用《林连玉基金》名堂筹款，因此要求警方彻查这类活动是否涉及欺诈或欺骗的犯罪行为。

岑启铭是在今日前往怡保中央警局报案，并向媒体发表文告。他指出，“林连玉”三个字近年来已被一小撮不负责任的人士利用，而报案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求警方协助制止“林连玉”三个字继续被利用或滥用，以还林连玉一个清白，让他永远安息，不要让他死后反而成为争论性人物。

“我们重申，林连玉是公认的华教斗士，没有人会反对林连玉。我们感到痛心和无法容忍的是：“林连玉”三个字近年来已被一小撮不负责任的人士利用，”

“至于已被误导而捐助“林连玉基金”的捐款人是否要要求退回他们的捐款，以及被误导成为非法的“林连玉基金”各地联络委员会成员的人士是否要辞职或退出，我们完全尊重有关人士的意愿。”

岑启铭也在文告末端表示，由于有关事件已向警方报案，完全交由警方处理，不想在现阶段回答媒体的任何提问。

岑启铭报案号码是：Dang Wangi Report: 42128-10，其报案内容的华文译文如下：

“我们要举报一个中文名称为《林连玉基金》的非法团体，以设立《林连玉纪念馆》为名，在全国各地向华人社会特别是热爱华教的人士发动捐款，数额已高达四百万令吉。

我们发觉，这个非法团体的地址是：321-D, Lorong T.A.R. Kanan Satu, Off Jalan Tuanku Abdul Rahman, 50300 Kuala Lumpur, 这个地址也是另一家名为 LLG 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e Bhd (Co. No. 340615-V) 公司的营运地址。

我们也发觉，一些不负责任的份子利用这个非法的《林连玉基金》名堂所筹获的捐款，都进入LLG 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e Bhd. 户口。

我们要求警方立即展开调查这类活动是否涉及欺诈或欺骗的犯罪行为。这就是我们的报案。”

针对岑启铭的报案，林连玉基金执行长姚丽芳在接受《当今大马》询问时，即时的反应是好气又好笑，无话可说，“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一直紧咬着我们不放。就让他去报案吧，我们看了再处理。”

她表示要向林连玉基金理事反映后，才作出正式的反应，并建议媒体浏览林连玉基金会网站的“历史与现况对话录”以了解实情。

遭政府干预耗费9年注册

根据林连玉基金网站的介绍，在华教斗士林连玉于1985年12月18日溘然长逝后，为了纪念他及发扬他的精神、贯彻他的理想，以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为首的十五个华人社团设立了“林连玉基金委员会”（简称林连玉基金），并交由教总托管。

15 华团于1985年12月28日成立了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后，委托当时董总法律顾问饶仁毅律师申请注册，不过基于林连玉的名字被当局视为敏感性字眼，多年努力不果，最后改以林连玉先生英文名字缩写“LLG”提出申请，终于在1995年以“LLG 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e Berhad”的名义获准注册。至于中文名字“林连玉基金”，因已沿用近十年，为大众所熟悉，且与政府的注册条件无关，所以就保留。

该网站强调，林连玉基金的争取注册，前后花费了9年时间，与当年华总申请注册被拖8年一样，追根究底是政府干预民间结社自由的结果。

至于林连玉基金为什么是以非营利有限公司（Berhad）形式注册？该网站解释，林连玉基金申请注册屡次不成时，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3年）和董教总教育中心（1994年）皆成功以非营利有限公司形式获得注册成立，因此林连玉基金委员会于1994年4月2日第十八次会议上决定参考这两个机构的做法提出申请，当时出席会议者包括已故教总主席沈慕羽、前教总副主席陆庭谕以及现任董总主席叶新田等。

截至2010年10月24日，林连玉纪念馆建设基金总共筹获4百万令吉，由于觅地困难，这笔专款至今仍原封不动。网站强调，林连玉基金运作经费与纪念馆专款是两笔不同款项，账目皆经过专业会计公司审查并提呈公司注册局备案。

完

依法重选，重建董总：董总危机资料集

出版者：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林连玉基金、独立大学有限公司、华社研究中心、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

通讯处：No. 89&9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email: info@llgcultural.com

电话：03-21422496/2497

出版日期：2014年12月17日